

SGRA REPORT

SGRAレポート No. 94

NO. 94

ISSN 1346-0382

第65届SGRA-V论坛

第五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第65届 SGRA-V 论坛

第五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 论坛主旨与展开经过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于2015年7月举办了第49届SGRA(关口全球研究会)论坛,讨论了“东亚公共财产”和“东亚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通过讨论确认了,首先我们要在东亚建立“知识共享空间”或“知识平台”,之后向东亚提供和解型策略的意义。

2016年9月以第3届亚洲未来会议为契机我们举办了首届“国史对话”,“国史对话”平台就是这样诞生的。迄今为止三个国家的研究者之间虽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对话,但能左右各国历史认识的“国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还不够充分,从这一意识出发,我们首先探寻了可能让东亚历史形成对话的条件。

为从结构上理解本国史与国际关系,第2届国史对话设定了“蒙古来袭和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全球化”的主题。2017年8月在北九州,来自日本、中国、韩国、蒙古的11名国史研究者聚集在一起,从各国国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报告后,从东亚历史的角度,对朝贡册封、蒙古史与中国史、资料的处理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第3届国史对话进一步将考察时间往后推,设定了“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议题。2018年8月,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9名国史研究者聚集在首尔,讨论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和满洲的皇太极各两次入侵朝鲜,以及其背后以银贸易为主轴的紧密的经济关系,和战乱后的安定问题。

第4届对话的主题是“‘东亚’的诞生:19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2020年1月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国史研究者聚集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围绕各国的“西方认识”,“挑战传统和创造传统”,“跨国界人的移动”问题进行了报告和广泛的讨论。

第5届对话以“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应对”为主题,由于新冠疫情2021年1月于线上举办。会议思考了各国在19世纪如何认识传染病问题,提出了怎样的应对对策,并探讨了各国的相互协作情况及其局限性。除了来自各国的论文报告外,还有非常多的前4届会议的与会者以小组成员的身份参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因为新冠肺炎不得已在线上举办,但是我们因此而建立了Zoom网络研讨会这个平台,促成了一次有意义的对话。此外,为促进对话顺利进行,会议安排了中日、日韩、中韩语言的同声传译。

为建立参会人员的交流网,今后在继续举办国史对话的同时,我们还会配发使用三国语言编撰的报告书,并以邮件杂志形式推送与会者的文章等。

※ 往期邮件杂志请由以下网址阅览

<https://kokushinewsletter.tumblr.com/>



关于 SGRA

SGRA 以从世界各国来到日本、经过长期的留学生活并在日本各大学的研究生院取得博士学位的“知日派”外国研究者为中心，从事对勇于挑战全球化课题的个人或组织在制定方针和战略时有所裨益的研究，为解决问题建言献策，并将其成果以论坛、报告书、网页刊登等形式，广泛地公诸于社会。对于每个研究课题，都分别由多领域、多国籍的研究者人员组成课题组，广集智慧与人脉，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展开分析和考察。SGRA 不以特定的学科或某一专家群体为对象，而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展开领域广阔的、国际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活动。SGRA 的基本目标是为良好的地球市民的实现做出贡献。详情请参看主页 (www.aisf.or.jp/sgra/chinese)。

SGRA 简报

每周四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SGRA 论坛等的通知和世界各地 SGRA 会员的文章。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订阅 SGRA 简报。想要订阅的读者可以通过主页自动登录。

<http://www.aisf.or.jp/sgra/>

第五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时间 2021年1月9日(周六)
方式 通过Zoom Webinar线上举办
语言 使用中日韩三语同声传译
主办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第1场	[主持人：村 和明(东京大学)]	
【欢迎致辞】	引言	4
	今西淳子(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开幕致辞】	第5届 圆桌会议致辞	6
	赵 珧(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报告论文1】	开港期朝鲜的霍乱流行与开港场检疫问题	8
	朴 汉珉(东北亚历史财团)	
【报告论文2】	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病对策与开港场	16
	市川智生(冲绳国际大学)	
【报告论文3】	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	23
	余 新忠(南开大学)	
【指定讨论】	【指定讨论1】 报告点评 金 贤善(明知大学)	27
	【指定讨论2】 报告点评 盐出浩之(京都大学)	29
	【指定讨论3】 报告点评 秦 方(首都师范大学)	30
第2场	[主持人：南 基正(首尔大学)]	
	自由讨论	32
	论点整理：刘 杰(早稻田大学)	
	自由讨论：小组成员(国史对话项目参与者)	
	总 结：宋 志勇(南开大学)	
	评 论：明石 康(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闭幕致辞：三谷 博(迹见学园女子大学)	
	预交评论	48
	代后记	
	金 罔泰56、金 贤善58、平山 升61	
	作者简介	63
	参加者名单	64

※ 同声传译
韩语⇌日语：
李 惠利(韩国外国语大学)、
安 映姬(韩国外国语大学)

日语⇌中文：
丁 莉(北京大学)、
宋 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文⇌韩语：
金 丹实(自由职业)、
朴 贤(京都大学)

欢迎致辞



引言

今西淳子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

[原文为日语。翻译：陈璐（东京外国语大学）]

祝大家新年快乐！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国史对话”会议。

我是渥美国际交流财团的常务理事、SGRA 代表人今西淳子。

SGRA 是于 2016 年开始启动“国史对话的可能性”项目的。

去年正好这个时候，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召开了第四届国史对话会议“东亚的诞生”，各位老师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那时就谈到过在武汉发生的神秘疫病，真没想到之后全世界会如此受到疫病大爆发的冲击。东京现在已经第二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了，我们因新冠病毒所受的疲惫也在日益加剧。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史项目启用网络会议的方式，开始在网络新平台上举办。这次会议日语、中文、韩语的报告论文各一篇。除了 3 名指点评人之外，参加过之前 4 次国史对话的 30 位老师也作为小组成员参加。网络研讨会的成员可以打开麦克风和摄像头。大家今天参加会议时请打开摄像头，麦克风只在发言时打开，其他时间请关闭。不过，由于时间有限，可能无法请所有人发言，这一点敬请大家谅解。此次会议与前几次国史对话不同的是，这次有 120 多位普通与会者参加。普通与会者可以通过问答和聊天功能向论文报告人和小组成员提问和评论，但今年会上可能没有时间作答了，之后我们会用报告书作书面回应。

这次我们也请来了 6 位老师负责日中韩三国语言的同声传译工作。我在东京说的日语，会被他们在首尔翻成韩语，在北京翻成中文，世界各地的听众都可以选择自己想收听的语言听会。

在线举办的优势就在于可以这般超越空间限制。这次的论文报告人、讨论者和小组成员们都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等各地，一般参加者中更有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参加的。

网络会议、网络研讨会虽然以前就有，但随着新冠病毒的流行迅速在社会中普及开来。对于“国史对话”项目来说，网络研讨会这个新平台的搭建甚是难得，我认为在新冠疫情结束后，通过虚拟和现实的结合，我们这个项目能够进行得更持久。

今天，请大家期待并享受第一次在线举办的“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

开幕致辞

第 5 届圆桌会议致辞

赵 珧 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首先，对以“19 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为主题的第 65 届 SGRA-V 论坛暨第 5 届“中日韩三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网络学术大会（Webinar）的召开表示祝贺。由于本届大会是在网上举办，因此与面对面举办的会议相比，在增进相互理解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当今时代我们已逐渐熟悉通过网络进行沟通交流这一方式，这种倾向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本次举办的非面对面学术会议的意义在于，为今后积极推进的非面对面对话奠定基础。因此，对此次非面对面学术大会的召开应赋予更多的意义。

本次学术大会将“19 世纪”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学术大会上讨论的 19 世纪，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International）概念正式登场的时代。此时抬头萌芽的“国际”这一概念，经历 20 世纪到现在为止，成为了贯穿人类历史的重要关键词。同时，为应对这一词汇，“National”的意义也得到了加强。在此过程中，各地区相继开始讨论本国国史。由此开始的国史，现在再次聚集在一起进行对话，是为了超越本国利益，为建立相互合作的健康“国际”而加强的新的努力。我想今天的学术大会的举办也正是出于增进相互理解之目的。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从 20 世纪末叶开始人类在各个领域重新汇合到了一起。互联网技术预示了新时代学术研究和科学技术领域以及包括国内外通商惯例在内的人类史各个领域的出现，并且在打破传统的国境或界限的概念后，这些领域迎来了新的突破。于是 21 世纪的世界在地理上更加接近，今天的首尔、北京和东京形成了一日生活圈。早晨飞往对方地区办公，晚上又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新时代正悄然来临。

但“国际”并非只具有积极的一面。自 19 世纪末叶以来不断增强的国际化给人类带来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 20 世纪末新自由主义狂潮等问题。而到了 21 世纪初的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国际”的另一个层面“全球性大流行病”（Pandemic）。今天的大流病现象即为“国际”的阴暗的一面。正如“Pandemic”一词的希腊词源所指示的那样，“覆盖所有人的”新型冠状病毒不仅摧毁了东亚国家，也摧毁了世界的国境，它敦促我们重新思考国家与国境的意义，以及思考所有边界的意义。

我们生活的 21 世纪就如此这般经历着地理概念的变化。我们正在体验着国家、国境、界限等文化概念的变迁。21 世纪的我们迎来了确认“时间”这一物理概念变化的时期。Pandemic 也敦促我们对目前生活的 21 世纪这一时间的意义进行重新思考。即，作为物理时间的 21 世纪在 20 年前已经来临。但是，直到我们共同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才真正确认进入到了与 20 世纪分离的新的世纪。比起物理学意义的“世纪”这一简单概念，我们进入的是蕴含着特殊文化价值的 Post-COVID（后新冠疫情）的新时代。

在 Post-COVID 时代举行的此次学术大会聚焦 19 世纪时的中日韩三国。19 世

纪是这三个国家都转变为近代国家的时期。随着三个国家的近代国家转型，领土观念不断增强，国境也得到了强化巩固。正是在这个时候，东亚发生了传染病。三个主权国家在应对传染病的同时，提出了象征近代化的强化公共医疗的问题。试想一下，那时和现在有百年以上的时间间隔。但我认为，对 19 世纪 Pandemic 问题的研究，可以为 21 世纪的今天的状况，即在 Post-COVID 时代中展开的新“国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典范。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在东亚建立起“知识共享空间”与“知识平台”，并以向东亚市民社会提供智慧为目标而做出各种努力，其中之一便是“国史对话”。自 2016 年 9 月在北九州举行第 1 届对话以来，通过在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地举行的一系列对话，我们确认了东亚国家之间的关联性。我认为，这一确认工作将成为推动相互和解与促成共同认识的崭新未来的基石。此外，今天召开的 SGRA-V 论坛第 5 届国史对话（Webinar）作为从现在的立场审视过去并开创真正的 21 世纪 Post-COVID 时代的工作的一环，值得高度评价。

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前几届对话的出席者也将以讨论者的身份一同参与此次第 5 届对话的 3 场报告。希望通过今天的报告、讨论以及自由对话可以汲取度过危机的智慧，为进一步向前迈进创造契机。今后也请各位多多关注和参与，期待以本次“对话”为主旨的学术大会能够继续开展下去。同时，对承办此次大会的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也深表感谢。参与该对话的所有人都是真正的 21 世纪 Post-COVID 时代的主角。谢谢大家。



开港期朝鲜的霍乱流行与开港场检疫问题¹

朴 汉珉 东北亚历史财团

[原文为韩语。翻译：朴 贤（京都大学）]

摘 要

此次报告着重阐述朝鲜开港以后周期性流行并造成众多人员死亡的代表性传染病——霍乱。对此我将探讨：为防止传染病扩散，各个开港场都采取过哪些措施，制定检疫规则时朝鲜和各国是如何应对的。1879年霍乱在朝鲜和日本各地大肆流行，死亡频发。为防止霍乱扩散，日方向朝鲜政府传达了含19项条款的《虎列刺预防及处理规则》并要求给予协助。此规则由明治10年内务省的《虎列刺病预防守则》和明治12年太政官的《虎列刺病预防暂行规则》组合而成，并结合朝鲜情况增加了补充条款。两国开始共享有关霍乱预防和感染者处理的管理规定，这一点值得关注。但是在避病院（编者注：收容、治疗感染由已于平成11年（1999年）废止的传染病预防法所规定的法定传染病的病人的隔离医院）的设置与卫生的认识上，朝日两国之间存在立场差异。霍乱在1886年也曾在全国流行，以开港场釜山、元山、仁川为中心，朝日两国展开了防止霍乱扩散的应对举措。朝鲜各开港场在应对霍乱流行时，各国的官员为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互相协作，有时也因经济利害关系，在检疫实行上发生过摩擦。当时出现了“由谁、如何设定实施检疫的标准、如何设定相关规则的适用对象”的问题。在检疫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各国的利害关系与保护本国侨民的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即便有正当的实施宗旨，且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但在开港场，任何一方都难以单方面主导检疫规则执行的贯彻，仍必须先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经确认，在讨论朝鲜政府起草的检疫规则条款时，日本方面甚至想参考清国的各国租界及意大利的运营事例。

一、前言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COVID-19）爆发并急剧扩散，席卷了全球。目前日平均感染人数已超过60万人，累计感染人数则突破了5000万人（截止到2020年11月初）。前所未闻的新型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的猖獗，引起了人们对传染病的高

¹ 本文由作者既有两篇论文的概括和补充新材料而成。（朴汉珉《1879年的霍乱传播与朝日两国的应对》（收录于今西淳子编《致亚洲的未来：我的提议》（日文），Japan Book, 2017）；朴汉珉《1886年朝鲜霍乱的流行与开港场的检疫》（韩文），《医学史》29-1，大韩医史学会，2020。）

度关注。属于这类传染病的还有鼠疫、霍乱、天花、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本文将着重论述朝鲜开港后的代表性传染病——霍乱。霍乱曾在这段时期在朝鲜周期性地流行，且导致了大量的人员死亡。随着定期航线的开设，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持续增加，霍乱开始以开港场为中心频繁流行，因此最先制定并实施检疫规定的也正是在开港场。

于开港之后的1879年，霍乱在朝鲜大范围流行。根据推算，当时大概有6万至7万以上朝鲜人因病死亡。为了霍乱的防疫工作，釜山港的日本管理官针对自国在留民实施了《虎列刺预防及处理规则》，共包含十九条具体规定。公使代理花房义质将此规定（前述《规则》）翻译并转达给了朝鲜政府，以便朝鲜在预防传染病时进行参考。此规定的主要内容来自日本政府颁布的《虎列刺病预防守则》（1877）和《虎列刺病预防暂行规则》（1879）的诸项条文，是对其进行甄选和整理而成的。

1886年，霍乱在朝鲜各地再次流行。根据黄玗《梅泉野录》记载，当时“怪疾”横扫朝鲜全境，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人，相当于蒸发了一个道的人口。同年，日本也是霍乱盛行，全国死亡人数达到了108,405人。进入1880年代以后，因霍乱而死亡的人数最多的年份就是1886年。（山本俊一，1982:69-70；辛圭焕（音译），2018:5-6）。

1886年的朝鲜，迎来了釜山、元山、仁川三地的开港，着手筹建租界，在各个开港场设立了海关，开始办理各种相关业务。但是针对出入开港场的各国船舶和人员，此时尚未制定出检疫规定以进行系统性管理。在此情况下，霍乱的举国蔓延导致了死亡人数的持续攀升。因此背景，开始以开港场的各国官员为中心，摸索如何来阻止传染病的流入以及防止传染病的跨区传播的方法。因为这些官员肩负着管理自国民众的责任，并身处抗疫第一线。可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而完善的应对指南，他们只能临时制定和实施检疫规定，因此在这一过程出现多种试错也是在所难免的。

本文将主要围绕朝鲜三处开港场的霍乱预防工作，对其检疫的具体过程进行探讨。当时，居住在开港场的日本人有2,961人，在外国人中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清朝人有349人²。在传染病发生之后，日本是表现最为积极的当事方之一。日本为了保护自己的租界，主动与朝鲜官员交涉，商讨实施临时检疫规定的问题。当时朝鲜政府尚未制定检疫规则，因此日本领事只能是先提议规定的实施，然后再由朝鲜监理、海关税务士以及各国领事一同协商具体的实施方法。下面将探讨，面对霍乱肆虐的开港场，朝鲜和日本是怎样开展防疫活动保护自国百姓，并从中察看两国对检疫问题的认知。

二、仁川港的临时检疫规定实施与事后撤回

接到釜山霍乱大流行的消息后，仁川的日本领事铃木充美拿出两种对策，以阻止霍乱传入港区。其一是组织卫生会，保护日本居留民。其二是制定针对进入仁

2 日本人的分布情况是，釜山1,976人、仁川706人、元山279人（李东勋，2019:51）。清国人的情况据说是，釜山87人、仁川205人、元山57人（朴正铉，2010:57）。关于1880年代中期居住在开港场的西洋人的人数，寻找统计结果并非易事。单以1897年的仁川为例，其境内有英国人17人、美国人和德国人各有14人、法国人9人，合在一起也只有63人。据孙祯睦的研究，在各国租界开设之初，日本人的比例一直高居在95%以上（孙祯睦，1982:163-164）。

川港的船舶的临时检疫规定，并将其推进实施³。由于事关紧急，铃木充美同各国领事及仁川海关长代理史纳机（J. F. Schönicke）进行了面谈。基于此，他制定出了临时检疫规定，适用范围是于当年进入仁川港的所有船舶。史纳机立即同意了此规定⁴。临时规定也从而拥有了实际效力。

收到仁川领事汇报后，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虽然同意海关长提出的船舶检疫临时规定，但他也担心此规定适用于日本船舶时，有可能会成为“分割我们行政权的契机，因此发生相当不利的状况”。高平小五郎意识到，如果按照临时规定的内容实施的话，在发动检疫权的时候可能会留下不好的先例，即将日本当前享有的行政管理权限转交给朝鲜政府。同时他也指出规定里没有提到设立隔离医院、选定检疫官等具体的内容和办法。但是由于事态急促，他指示先按照增删的内容来实施此规定⁵。第二天，铃木充美就代理公使指示的性质，承认本次检疫规定的实施属于发动行政权。他表示此次实施的临时检疫规定仅对从仁川入港的商船有效，其目的是为了阻止传染病的传入，并且此规定是与仁川海关长及各国领事磋商后制定的。他强调了此规定的“临时性”，即它是“一种约定”，其性质与对一般民众施行的行政法规不同，并举了日本的先例。据此他判断，“我们（日本）这次同意海关制定的临时检疫规定，不代表我们同意割让自己的行政权”⁶。同时还附上了说明，即包括英国总领事在内的美国副领事、清国领事也同意了临时规定的制定宗旨。不仅是铃木充美本人，各国外交官也都在担心霍乱的传播，从而赞同海关制定和实施临时检疫规定，所以并不认为此规定构成“涉及条约所规定权利的重大事宜”。紧接着，铃木充美将临时船舶检疫规定公示于居住在仁川港的日本人，并向本国汇报将于7月15日起实施该规定⁷。

关于临时规定的实施与否，仁川领事报告询问的是日本外务省，由此日本政府开始探讨审查相关事项。外务大臣井上馨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汇报情况，并对此事在法理上存在的问题表示担忧。井上馨指出朝鲜属于签署《治外法权条约》的国家，所以将朝鲜法律直接适用到在留日本人，这本身与“条约精神相悖，难以给予承认”。与此同时他也判断，因传染病对两国人民都会造成严重伤害，在此情况下，虽然公使或领事未被委以法律制定权，但仍应许可他们与朝鲜政府协商制定检疫规定，并以公使之名义将其颁布。由此他建议，在不具备制定法律资格的情况下，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要与当事国协商后实施检疫，若有违反者，则按照日本国法律和预防规定来进行处罚。日本内阁采纳了外务大臣的建议，并向驻朝鲜日本公使发出训令，让其按照此建议内容处理检疫相关事宜⁸。

3 公信第117号(1886.6.27) 铃木充美→青木周藏“仁川港”《朝鲜国仁川元山京城釜山检疫规则制定》(以下资料名为《朝鲜国检疫规则》)(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Reference Code. B12082328300: 0246)。

4 公信第74号附属甲号京第65号(1886.6.18) 铃木充美→高平小五郎“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300: 0235)。

5 公信第74号附属乙号仁第40号(1886.6.22) 高平小五郎→铃木充美“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300: 0236)。

6 同上文书。

7 公信第126号(1886.7.17) 铃木充美→青木周藏“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2082328300: 0269)。

8 亲展送第417号附属文书(1886.7.19) “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300: 0254)。

不过内阁的这一决定，与仁川领事在仁川港内公示的临时检疫规定的生效日相比，已经晚了四天。外务大臣用电报向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发出训令是在7月26日。这又是在内阁下达指示的一周之后⁹。换言之，在本国的决定最终下达到仁川之时，仁川领事已经在朝鲜当地制定临时检疫规定并付诸实行了十一天。外务省指出了领事的这一越权行为，并指示“立即取消对海关长公文的承认”。铃木充美向高平小五郎发出请求，要他以电信形式明确这一“取消”处分。同时他还报告，实际上由于霍乱已经开始在仁川蔓延，船舶检疫规定并没有得以实施¹⁰。原计划是同仁川当局协调完毕后，准备实施规定来应对霍乱。可现实情况是，因为租界内的感染患者急剧增加，仅仅是进行消毒、设立隔离医院等应对措施，就已经把防疫现场弄得手忙脚乱。因这些燃眉之急，仁川港的船舶检疫规定迟迟未能得以实行。与仁川港的严峻疫情相反，釜山港的疫情却逐渐平息下来。检疫规定对外部入港船舶的实施效果也随之减弱，海关长甚至还提出了应该暂时中止检疫规定的实施¹¹。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在铃木充美汇报完检疫规定实施事宜之后，随着仁川当地疫情愈演愈烈，应对的优先顺序也发生了变化。

高平小五郎收到仁川领事的汇报后，向外务大臣致电建议了取消临时规定的具体程序。其建议是：首先要回到最初承认临时检疫规定的原点，取消对这一规定的承认，并撤回向居留民下达的公示；之后再与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外衙门）重新协商，以规定对违反者的处罚方法¹²。外务省同意了高平小五郎这一提案。高平小五郎则按照外务省的训令，向仁川领事通报“取消对临时检疫规定的承认，并撤回贵馆下达的公示”¹³。至此，铃木充美在仁川港公示要限时实行的临时检疫规定失去了效力。

三、元山港的检疫规定实施过程中达成的共识与各国的协作

元山领事馆得知釜山港正在流行霍乱的消息后，决定自6月1日起对入港船舶实施检疫。同时还制定出预防霍乱的注意事项及临时规定，向居留民公示令其遵守¹⁴。外务省收到了书记生奥义制的报告，了解到元山的霍乱应对情况，并对其进行审查。结果是对《虎列刺预防及处理暂行规则》的第二十条至二十二条的内容进行了文字修正，而对《避病所暂行规则》的全文十三条规定则表示没有异议，可直

9 电信训令案(1886.7.26) 井上馨→高平小五郎“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20823283300:0264)。

10 机密第84号仁川海关检疫一件第二别纸甲机密第20号(1886.8.5) 铃木充美→高平小五郎“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8300:0294)。

11 机密第20号(1886.8.8) 铃木充美→青木周藏“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8300:0298)。

12 机密第84号(1886.8.6) 高平小五三郎→井上馨“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8300:292)。

13 公信第177号附属乙号机密第39号(1886.9.5) 高平小五郎→铃木充美“仁川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8300:0306)。

14 第70号(1886.6.21) 奥义制→青木周藏“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8800:0329)。

交付诸实施¹⁵。

两个月后，包括永兴在内，元山也出现了霍乱患者。领事代理奥义制向元山监理李重夏和清国元山署理通商事务姚文藻发送公文告知，自8月7日起日本租界的出入口仅留南面一处，并要对两国所有出入人员及其所携带物品进行消毒。同时，封锁烽燧台下方的道路和其他通道，以防止霍乱的传入¹⁶。但是朝鲜和清国官员均回复日方，需询问上级机关再作决定，理由是《通商章程》上没有相关条文规定这一问题。姚文藻的立场是，“此系《通商章程》，事关重大，因无明确条款可依，本署理事无法自作主张”¹⁷。李重夏也表示釜山已经在实施此规定，但有诸多不便出现，且有阻碍商业之嫌，因此“章程未载之事，不敢擅自许之”¹⁸。朝清两国官员认为，无法任意实施条约上没有规定的内容，因此没有立即接受日方关于实施消毒的协助邀请。对此，奥义制提及事先约定事宜，即滞留在日本租界的外国人需遵守日本领事发布的各种规定与警察法，并表示拒绝接受消毒“甚为奇异”¹⁹。即便如此，姚文藻仍然坚持要询问袁世凯后再作处理，并回复日方的规定只能适用于日本商人，明确了日方提议的消毒规定不能马上适用于本国百姓的立场。

此后，李重夏、姚文藻、奥义制和元山税关长格类（E. F. Creagh）聚在日本领事馆，再次磋商消毒法实施问题。但由于各方的想法和立场的不同，很难对实施消毒问题达成一致²⁰。8月12日，奥义制给姚文藻发送了《虎列刺病预防略则》及其汉译版，整理了可对三国居留民共同实施的消毒方法，并要求姚文藻若无异议请速公布。姚文藻则回复称，因霍乱应对事宜与各国均有相关，需与元山监理、海关税务司一同探讨后再决定，并表示对《略则》内容则无异议²¹。元山副领事渡边修将此内容发给李重夏并请求若无异议立即付诸实施。李重夏回复，将据此《略则》内容进行应对，只不过有附加条件，即对于朝鲜官员及吏隶需单独立约²²。李重夏起草了《拟防疫章程议定后另约二条》发送给渡边修，其内容是关于出入朝鲜官署的官员及属吏要从消毒法实施对象中除外，不能与商人同等对待。另外，他还要求日方在确认朝鲜官吏的服色和标识之后，不能在路边对其进行消毒或问责。

渡边修当日就回函称无异议。关于李重夏提出附加条件的意图，在渡边修与朝方往来的公文中没有被提及，但在其向外务省报告的文书中却可以得到确认。渡边修表示，如果将出入官署的朝鲜官员和属吏也包含在消毒法实施范围之内，朝鲜官吏不得不以与普通百姓相同的方式接受消毒，那样他们会觉得有损颜面。作为官

15 送第5060号(1886.7.5)青木周藏→奥义制“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800: 0338)。

16 第105号附属第10号(1886.8.7)奥义制→姚文藻(Ref. B12082328800: 0350); 第31号(1886.8.7)奥义制→李重夏“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

17 第105号附属1号(1886.8.7)姚文藻→奥义制“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800: 0352)。

18 第105号附属第18号(1886.8.8)李重夏→奥义制“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800: 0360)。

19 第105号附属第11号(1886.8.8)奥义制→姚文藻“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800: 0353)。

20 第105号(1886.8.21)渡边修→青木周藏“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800: 0347)。

21 第105号附属八号(1886.8.13)姚文藻→奥义制“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800: 0367)。

22 第105号附属第22号(1886.8.16)李重夏→渡边修“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 B12082328800: 0370)。

吏，他们重视自己的社会威信，而且认为有必要与普通百姓区分开来，所以强烈反对将消毒规定同等适用于官吏。加之实施消毒法的主体又是日方，朝鲜官民则均沦为被消毒的客体，这样就有一种被牵着鼻子走的印象，因此反应也就更为敏感。

在日方接受了朝方的要求事项的基础上，消毒法实施问题终于达成了一致。渡边修通过公文往来协商，得到了清国及朝鲜的同意，最后通报两国将于8月17日开始实施消毒法²³。李重夏和元山通商事务书记官刘希文分别回复日本，将向自国民众公示此事并使其遵守此规定²⁴。

在元山，朝鲜、清朝、日本三国官员之间就预防霍乱事宜的协商和合作进行比较顺利。其特点是，在出入日本租界时，朝鲜官吏被排除在接受消毒人员之列。在此协商过程中可以看出，朝鲜官吏与普通百姓相比更加重视自己的卫生状态和社会威信。

四、围绕釜山港检疫规定实施的争议与冲突

霍乱从5月份开始就已在釜山流行，并且平均每天有20人左右发病死亡。在确认邻近地区情况后，日本领事馆切断了朝日两国民众在租界的往来，并向朝方发送公文，决定开始实施预防霍乱的检疫方法。此时检疫本部已经在龙尾山和租界内设立并运营了三处分所²⁵。自6月3日起开始对出入日本租界的朝鲜人，不分官民一律喷洒消毒水。第二天开始直接切断了人员往来²⁶。在监理署工作的闵建镐对此表示极为不解，因为日方要求执行通商公务的朝鲜官员也要一律遵守消毒程序。他甚至建议监理，应该向日方发送公文抗议此事²⁷。

两周之后，当日本领事馆要实施包含霍乱预防方法及适用范围的检疫规定时，问题也随之产生。驻釜山日本领事所通知的检疫规定共由十二项条文构成²⁸。这十二项条文规定了对出入日本租界的人员和物品进行消毒的方法和限制，实施目的是防止和管控霍乱传入租界。虽然如此，这只不过是日本领事馆为了保护自国民众而匆忙制定的强制性规定而已。在各国外交官看来，此规定是未经事先协商的、并且是由日方单方面提出来的。

包括东莱府使在内，海关税务司和清国理事官均收到了釜山领事代理官本罍发来的检疫规定的副本。但是他们以其中部分内容有失妥当为由，反对检疫的实施。朝方也逐条整理删改事项后，发至釜山领事之处²⁹。其涉及内容包括：取消对出入租界的人员发放许可证（第二条）、喷洒消毒药需区分官员和商人（第六条）、日本

23 第37号(1886.8.16) 渡边修→李重夏(Ref.B12082328800: 0377)；第15号(1886.8.16) 渡边修→刘希文“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8800: 0378)。

24 第105号附属本号(1886.8.16) 刘希文→渡边修(Ref.B12082328800: 0381)；第105号附属第24号(1886.8.16) 李重夏→渡边修“明治十九年元山港检疫规则相关事宜”《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8800: 0380)。

25 “釜山及马山浦流行病(本月二日釜山特发通信)”《东京日日新闻》(1886.6.11)。

26 《海隐日录》(一) 丙戌五月二日、三日(釜山近代历史馆编, 2008:563-564)；“釜山通信”《郵便报知新闻》(1886.7.7)。《海隐日录》是在釜山监理署工作的闵建镐留下的日记。

27 《海隐日录》(一) 丙戌五月三日、四日(釜山近代历史馆编, 2008:563-564)。

28 机密第9号别纸1号“釜山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9100: 0439-0441)。

29 《东莱府与日本领事往来照会》。本资料未记具体年份，但记载了在1886年霍乱流行当时，釜山监理与日本领事之间往来的部分文书。此资料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可以在线阅读。

领事对税务司权限的侵犯（第九条、第十条）等问题。此规定以预防租界内传染病流行为由，将日本官吏的职能设定为身居朝鲜人之上的监督者和管理者，这带有浓厚的侵犯国家主权之嫌疑。因此朝方指出，日方的此次应对方式是“一种专断”、“并不是一个开港场领事可以决定的问题”，是一种越权行为，就此问题“有必要拟文询问利害相关的官员并征得他们的同意”。朝鲜监理表示，应与海关税务司、清国理事官、日本领事一同制定单独的章程。鉴于此，日方只能将检疫范围局限在自国居民。

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也听到消息说，居住在釜山的外国人对釜山日本领事馆实施的检疫规定爆出不满。高平小五郎解释道，日本本国政府也在严格实施检疫法，因为这与“整体居留民的卫生预防相关”，所以“当然要从起初开始严格详实地执行”³⁰。他认可了与卫生相关的检疫法实施的必要性，但也无法放任事态继续发酵，引起外国人不必要的不满。因此他指示宫本黑调查引起不满的原因和实际检疫的经过，并将其详细汇报到外务省³¹。

外务次官青木周藏判断，宫本黑在釜山港施行检疫预防规定之际，想把日方制定的规则同样地适用于朝鲜人及外国人身上，这个行为“超出领事权限范围”构成问题。若想在开港场发动检疫相关的行政权，具体流程首先需要与朝鲜官员及各国领事进行协商，然后取得其上级即公使的许可，再正式公示于居留民。宫本黑则省略了这个流程，直接制定出预防霍乱的新的检疫规定，并通知各国外交官，因此犯下了重大的程序错误。此事是因宫本黑自身不谨慎而引起，所以青木周藏也只能斥责他。青木周藏明确地告知宫本黑，今后在实施检疫规定之前，必须先由日本公使与朝鲜政府进行协商。他同时还提供了釜山港应对霍乱流行时可参考的一个案例，那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元山监理、日本领事和清国理事官经过事先协商而实现防疫的元山港事迹。

五、结语

霍乱曾在开港期朝鲜有过多次的全国性流行。自 1886 年起，以釜山、元山、仁川三处开港场为中心，开始有了预防霍乱流行的防疫活动。但这个时期的朝鲜政府尚未处于正式完善官方检疫规定并投入实施的阶段。因此在朝鲜的各个开港场出现了各自不同的应对方式。其中既有像元山港一样，各国积极协助进行防疫的案例，也有像釜山港，反对日本领事起草的检疫规定方案，指出其越权等问题而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情况。

在 1886 年当时，确实存在实施检疫的必要性，以此防止霍乱的地区性扩散，并保护自国民众，对此各国官员也表示认可。但是具体问题出现在，到底应该由谁来制定检疫实施标准、如何设定相关内容及如何界定适用对象的范围等方面。在朝鲜各个开港场工作的日本领事以事态紧急为由，提出了管理条款草案，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想抢占检疫规定标准制定权的意图。只是关于检疫规定的实施与否，还需要

30 机密第 9 号 (1886.7.16) 高平小五郎→宫本黑“釜山港”《朝鲜国检疫规则》(Ref.B12082329100:0426)。

31 同上文书(机密第 9 号, Ref.B12082329100: 0426)。

在各个开港场分别征得朝鲜监理、海关长和各国外交官的同意。再者，针对条约运营上是否存在问题，需经过本国的审查并获得批准的程序。

检疫规定的制定和实施，与各国外交官的利害关系和自国民保护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存在“时宜性”的问题，即便其宗旨是好的，也无法单方面地在开港场贯彻实施检疫规定。制定检疫规定并将其适用于各国人民，此事要落到实处势必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对开港场的他国居留民的管理权限是属于他国领事和公使的。若以情况紧急为由，在实施消毒、管制出入等方面强硬行使权限的话，有可能会为列强在事后以违反条约为由进行干涉留下口实。日本政府在开港场内实施检疫的问题上非常谨慎，因为日本强烈意识到此举可能会影响当时正以西欧列强为对象推进的修改条约事宜。另一方面，通过元山港和釜山港的案例也可以看出，即便事态紧急，朝鲜方面也对日方单方面制定和运用检疫规定表达了强烈异议并要求修正。因为以预防传染病为由，对自国民众行使强有力的管理权，这具有浓厚的侵犯国家主权的色彩。可以说，1886年在朝鲜开港场制定和运用临时检疫规定的过程，很好地体现出了各国处理检疫问题的态度。

〈参考文献〉

1. 资料

『역주 매천야록』 상 (황헌 지음, 임형택 외 옮김, 문학과지성사, 2005)

『海隱日錄』 I (閔建鎬 著, 釜山近代歷史館 編, 釜山近代歷史館, 2008)

『東萊府與日本領事往復照會』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 所藏)

『朝鮮國仁川元山京城釜山檢疫規則制定并ニ實施一件』 (日本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 所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erence Code. B12082327900)

『旧韓末條約彙纂』中 (韓國國會圖書館 立法調査局 編, 國會圖書館 立法調査局, 1965)

『조약으로 본 한국 근대사』 (최덕수 외 지음, 열린책들, 2010)

2. 论著

内海孝 『感染症の近代史』, 東京: 山川出版社, 2016

山本俊一 『日本コレラ史』,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2

辛圭煥 「1870~1880년대 일본의 콜레라 유행과 근대적 방역체계의 형성」 『史林』 64, 首善史學會, 2018

申東源 『한국근대보건의료사 (韓國近代保健醫療史)』, 한울아카데미, 1997

朴正鉉 「19세기末(1882-1894년)朝鮮華商의 조직과 상업 활동」 『中國史研究』 66, 中國史學會, 2010

朴漢珉 「1879年コレラの拡散と朝日両国の対応」 今西淳子編 『アジアの未来へー私の提案』, 東京: Japan Book, 2017

朴漢珉 「1886년 조선 내 콜레라 유행과 개항장 검역」 『醫史學』 29-1, 大韓醫史學會, 2020

孫禎睦 『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 一志社, 1982

李東勳 『在朝日本人社会の形成: 植民地空間の変容と意識構造』, 東京: 明石書店, 2019

报告论文 2



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病 对策与开港场

市川智生 冲绳国际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宋刚（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要

1859年日本正式开始对外贸易。当时成为贸易据点的，是通商条约指定的长崎、函馆、横滨、神户、新泻等开港场。这些港口既成为了通商和物流的据点，同时也成了急性传染病从海外流入扩散开来的场所。当时，在日本蔓延的传染病中，从国外被带入的有从1870年代持续至1880年代的亚洲霍乱和1900年前后的腺鼠疫。

在开港场的传染病对策中，为防止通过船舶感染而实行的海港检疫作为岛国的水际对策（边境防控对策）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实施过于严格导致物流停滞的难题。另外，根据当时的条约架构，日本很难对外国船籍的船舶实行日本行政规定的检疫法令。实际上也曾发生过由于英国公使的反对而造成检疫中断的情况，他当时因担心日本医疗技术不够成熟，且会阻碍到自由贸易，于是反对检疫。

另一方面，开港场市区的防疫中，为防止传染病向国内各地扩散，预设了出行限制、隔离、消毒等措施，但日本的地方行政和外国人居留地的双重行政对此造成了阻碍。此外，港口开放当初，能应对传染病的只有那些在居住地领事馆工作的医生和军医。他们为居住地社会的利害辩护，干涉了包括日本社会在内的开港场的防疫行政。

通常认为，具备以上特征的开港场防疫，为日本培养了应对传染病的人才，并随着法律层面上1899年新条约的实施而发生了转型。

1. 序言

开港场，指的是日本1858年之后与各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后开放的港口城市。早期有横滨、神户、长崎、函馆、新泻五个港口，后来又增加了大阪。开港场，由码头和保税仓库等港口设施、可供缔约国的居民租用、居住、通商的外国人居留地、以及周边的日本人居住区构成。这里不仅是日本的贸易流通据点，在传染病由

海外传入并扩散至日本国内各地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日本的开港场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日本经济史的角度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积累¹。另一方面，对作为侨民生活聚集地的外国人居留地的研究，主要是从东亚欧美人生活史的角度展开的²。另外，日本方面在居留地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尤其是针对外国人在日本租赁土地时的相关规定（地产规定）的研究³。近年来，也有从政治外交史领域展开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日本向外国侨民执行行政规定时产生的外交分歧⁴。今后我们还需根据日本方面以及位于各港的各国领事馆的相关记载，进一步弄清开港场的居留地制度及其实际的实施状况。

在本报告中，我们将以横滨、长崎、神户这三个开港场为研究素材，对其应对传染病的历史进行概述。在论述过程中，我们将在关注地域差异、传染病种类的差异、不同时期的防疫对策的变化变化的同时，思考在医疗保健方面日本人社会和外国人社会之间的关系⁵。

2. 横滨：以应对天花为契机谋求居留地自治

在明治初期，横滨的医疗活动的中心是由欧美旅日侨民建立的横滨一般医院（Yokohama General Hospital）。从该医院的运营形态来看，基本属于旅日外国侨民的慈善活动的范畴。实际来该医院就诊的，大多是途经印度、中国南方后到达横滨的船员或前来经商的短期居留者（Non-residents）。S. Eldridge（1843～1901）根据横滨一般医院的就诊记录，整理了当时横滨的卫生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梅毒、天花等传染病是影响旅日外国侨民健康的最大问题⁶。

从1870年末到1871年初，天花在横滨传播迅速，而居留地中也感染者众多。当时居留地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要求传染者在横滨一般医院里开设的各国天花医院（Smallpox Hospital）里接受种痘或隔离。而关于天花蔓延的原因，居留地方认为是由于周边的日本人社会没有采取恰当的防疫措施⁷。驻日英国公使 Sir H.

1 代表性研究为石井宽治《近代日本和英国资本：以怡和集团 Jardine Matheson 为中心》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2 J. E. Hoare, *Japan's Treaty Ports and Foreign Settlements: the Uninvited Guests, 1858-1899*, (Kent: Japan Library, 1994)

3 大山梓《关于旧条约下的开市开港问题研究：日本的外国人居留地》（凤书房，1967年）、斋藤多喜夫《横滨居留地的成立》（《横滨和上海：近代都市形成史比较研究》横滨开港资料馆，1995年）、同上作者《明治初年的横滨居留地：基于“金川纲规定”》（《横滨居留地和异文化交流：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都市研究》山川出版社，1996年）、同上作者《开港港则的成立过程》（《横滨开港资料馆纪要》第23期，2005年3月）。

4 森田朋子《开国与治外法权：领事裁判制度的运用和玛丽亚路丝号事件》（吉川弘文馆，2005年）、五百旗头薰《条约改正史：法权恢复展望与国家主义》（有斐阁，2010年）

5 笔者于2021年1月9日举办的第65届SGRA-V论坛第5届中日韩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上报告本文。本文是在下述已发表文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市川智生《近代日本通商港口的传染病流行与外国人居留地：1879年“神奈川县地方卫生会”的霍乱对策》（《史学杂志》第117篇第6号，2008年）、《明治初期的传染病流行与居留地行政制度：1870-1871年的横滨天花对策》（《日本历史》第762号，2011年）、《开港场神户的传染病对策与居留地自治》（《历史科学》第219号，2015年）、《神户：1899年开港场的防疫与外国人社会》（永岛刚、市川智生、饭岛涉编《卫生与近代：从鼠疫流行看东亚的治理、医疗、社会》（法政大学出版社，2017年）。

6 Stuart Eldridge, "Notes on the Diseases affecting European Residents in Japan, upon the basis of all available statistics", *Medical Reports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1th March 1878*, No.15.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7 "Small-pox and its Prevention", *Japan Weekly Mail*, Jan. 28. 1871., Vol. II. No.4., p.46.

Parkes (1828 ~ 1885) 命令曾在多个开港场从事过性传染病防治的英国海军军医 G. B. Newton (1830 ~ 1871) 来订立日本的天花应对方案，并直接要求明治政府实施此方案。可见，该时期横滨在应对天花时，是由英国为中心的居留地方掌握了主导权的。这一特点，不仅适用于居留地，也适用于本应由日本政府掌握主导权的居留地以外的区域。而从双方讨论天花防疫对策的天花预防会议是在英国领事馆召开的这一点上，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特点⁸。

而后，居留地方根据这一时期应对天花的经验，设立了“卫生委员会 (Board of Health)”，而居留地应采取独立的防疫措施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些声音认为，完全依赖于日本方，很难保证侨民免受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侵害。从居留地的这一动向，可以看出居留地方想要积极介入日本人社会的传染病对策的意愿⁹。这一时期对天花的应对，也成为了外国人居留地要求设立自治的医疗卫生组织的契机。

“卫生委员会”的构想 在 1877 年 (明治 10 年) 霍乱流行的时期得以实现，可见这一构想并不是纸上谈兵，居留地方为防止传染病从日本人居住地入侵外国人居留地而建立侨民自治组织的想法在这里得到了继承¹⁰。然而，在 1879 年 (明治 12 年) 霍乱大肆蔓延之际，神奈川县令野村靖 (1842 ~ 1909) 召集并组建了防疫会议 (神奈川县地方卫生会, Yokohama Local Board of Health)，成员中不仅有日本医师，也有英国领事馆、德国海军医院的医务人员。这说明居留地的“卫生委员会”已实质上被日本方吸收合并。但即便如此，认为这一时期港口在医疗保健方面已完全由日本人接手还为时过早。在霍乱防疫会议基础上建立的神奈川县地方卫生会，进行了街道卫生调查、厕所结构改造等一系列高水平的活动，而掌握这些活动主导权的，均为在赴任横滨之前曾在东亚各地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欧美医师。由此可见，在 1870 年代末的横滨，在传染病防疫中提供专业意见的仍然是居留地这一方。在横滨的日方防疫会议上完全看不到欧美医师的名字，是 188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

3. 长崎：独立防疫并为细菌学研究提供土壤

霍乱从中国沿海为首的东亚各地传入日本时的第一站便是长崎。因此，对于日本的公共卫生来说，长崎具有重要的意义。

1850 年代末，幕府在长崎设立了兼有医科学校和医院功能的养生所，老师是居于出岛的荷兰商馆医务人员 Pompe (J. L. C. Pompe van Meerdervoort, 1829 ~ 1908)，而在此接受医学教育的则是由幕府选派的学生或在当地从医的师徒等。明治以后，继任 Pompe 的荷兰医生也继承了这一点，并将其发展为专门负责诊疗的长崎医院和专门负责医学教育的长崎医学校¹¹。因而，长崎的一大特点，便是在其开放为开港场后很快就开始培养日本医师。比如，明治时期长崎医疗行政机构的中

8 FO262/218, No.2, R. Robertson to H. Parkes, Jan. 12 1871.

9 “The Board of Health”, *JMM*, March 25. 1871., Vol. II. No.12., p.144.

10 FO262/314, R. Robertson to H. S. Parkes, No.69, Sept. 20, 1877.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请参照：市川智生《开港场横滨的感染症历史：从1877年东亚霍乱流行的事例来看》（《乡土神奈川》第59号，2021年3月）。

11 长崎大学医学部编《长崎医学百年史》（长崎大学医学部，1961年）

心人物吉田健康（1846～1897）。他师从荷兰医生 Bauduin（A. F. Bauduin, 1820～1885）和 Mansveldt（C. G. Mansveldt, 1832～1912），后兼任长崎医院院长和县卫生科科长，1887年（明治20年）在长崎建立第五高等学校医学部时，更是成为了该校首任医学部主任。而同时期的横滨，是由传教士出身的美国医生和英国领事馆的医务人员交替担任县立医院的院长的，由此也能看到长崎在医疗的独立性方面非常突出。

长崎的居留地在设立之初，由英国居民为主的租地人组建了居留地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并在警备、消防、道路清扫、路灯管理等方面实施行政自治。1876年（明治9年），居留地委员会因财政困难而解散，行政权返还给了长崎县一方¹²。但第二年1877年（明治10年）的夏天，霍乱从厦门传入日本，并在作为西南战争政府军军事据点的长崎大肆蔓延。在日本方的相关记载中，没有关于长崎居留地的霍乱防疫对策方面的信息。但在驻长崎英国领事 J. Troup（1840～1925）寄给东京公使馆的信上，可以看到在长崎居留地以各国的领事为中心召开防疫对策会议、组织各国领事馆的医务人员和未航行的航船医生组建医疗委员会（Medical Commission）、并下令在居留地内实施卫生调查和防疫对策等内容¹³。居留地的这些应对措施，其实也反映了对长崎县厅内设立的“检疫事务所”的成员只有日本人这一点的不满。也就是说，虽然在制度层面居留地的行政自治已经结束，也一度有过由日本方对长崎的开港场进行一元管理的时期，但在如霍乱流行这样的紧急情况来临时，欧美各国的侨民还是在以一些非正式的方式继续其自治活动。

另外，在长崎医学校和长崎医院从事医学教育和日本患者治疗的荷兰医师，也定期将日本人的霍乱感染情况和县的防疫对策等信息传递给英国领事等人，整体上采取的是有利于居留地社会利益的行动。

长崎在1885年（明治18年）和1886年（明治19年）也出现了霍乱流行，但由于日本在细菌学、病理学等方面的医学研究的进展，防疫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该时期，长崎县从东京引进了医学学士山根正次（1858～1925）来长崎医院从事霍乱治疗方法的研究，还委托北里柴三郎（1853～1931）来进行霍乱的细菌学检查，可以说为霍乱研究提供了重要土壤¹⁴。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日本方想要让居留地一方知道，日本方已经吸收了以1883年 R. Koch 发现霍乱弧菌为代表的细菌学研究的先进成果，并企图在长崎的防疫对策上实施一元管理。从英国领事 J. J. Enslie（？～1896）的反馈来看，他虽对将防疫工作全部交由日本人完成存有不满，但基本上采取了依附于长崎县一方的姿态¹⁵。可见，由于长崎将医学研究的先进成果和防疫第一线直接连接了起来，他们得以在开港场的传染病防治中成功掌握了主导权。

12 大山梓《关于旧条约下的开市开港问题研究：日本的外国人居留地》（凤书房，1967年）

13 FO262/310, No.51., M. Flowers to H. Parkes, Sept. 14. 1877. 另外, FO262/341, No.25., J. Troup to H. Parkes, Aug. 9. 1879. 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14 北里柴三郎《长崎港虎列刺病调查谈》（《大日本私立卫生会杂志》第31号，1885年）、山根正次《虎列刺病通论》（英兰堂，1887年）

15 FO262/443, No.82, J. J. Enslie to H. Parkes, Sept. 1. 1885.

4. 神户：以应对霍乱为契机的自治扩大和变化

开港场神户是连接九州和横滨、东京的中继点，在贸易流通中占据重要地位。神户居留地由领事团和租地人代表组建居留地会议，并由居留地行事局来掌握行政自治权，直至 1899 年（明治 32 年）。行政自治的内容，包括警备、道路 / 下水的修缮、路灯管理等，这些均未超出居留地土地管理的范围。通过行事局的财政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自治得以长期维持得益于其限定了行政自治的活动内容，因而行事局的活动内容自然不可能涵盖居留地的所有行政内容。特别是各国侨民的出生、死亡、婚姻等属于居民管理范畴的事物，是交由各国领事来各自管理的，这体现了属人主义的原则。

在神户居留地，医院经营也是其实施行政自治的重要一环。通过居留地侨民的捐款，神户国际医院（International Hospital of Hiogo）得以建立并运营，并由美国传教医 Beery（J. C. Beery, 1847 ~ 1936）在此从事诊疗活动。

而关于居留地的传染病防疫对策，无论是日本方还是居留地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双方需要通过协商交涉来构建合作关系。1886 年（明治 19 年），霍乱从大阪直接传至神户，传播规模极广。由于居留地也频繁出现感染者，居留地行事局扩大了行政活动的范围，开展了挨家挨户的检查、隔离、消毒等防疫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有 8 国领事联名对居留地侨民发出了防疫活动的通告¹⁶。居留地的居民管理，本属于各国领事各自的管辖范畴。但在应对传染病蔓延这一危急情况时，则转而以居于神户居留地的居民为条件展开行政活动，这体现了属地主义原则。

但这种伴随传染病应对而发生的居留地自治的扩大，在 1890 年（明治 23 年）应对霍乱之际发生了变化，居留地方不得不接受日本方（兵库县）介入居留地内部的霍乱防疫工作¹⁷。可以认为其背后的原因，是以当时居留地行事局的财政规模，无法维持其在隔离、消毒等防疫手段方面的开销。此外，为了对包含居留地在内的神户这个开港场进行整体防疫，也需要日本方来承担居留地的传染病防疫工作。这种观点的背后，是认为单独在日本人社会或单独在居留地进行防疫工作都没有意义。1899 年居留地被废除之前，神户居留地的传染病防疫就已经交由日本方面进行统一管理了。

5. 神户和横滨：居留地废除后的情况与鼠疫流行

在 1899 年（明治 32 年）7 月条约修订并废除外国人居留地后，很快便在神户和横滨爆发了鼠疫。由于在两个地区都没有出现外国居民之间的鼠疫传染病例，因此在传染病防疫对策上只通过体检进行了疑似患者的排查。在神户对居留地的外国侨民进行体检和住所消毒工作的，是被兵库县临时雇佣的英国医生米勒（R. S. Miller，生卒年不详），他曾在神户国际医院工作。在此之后，日本方也通过雇佣

16 FO262/561, No.26., J. Troup to F. Plunkett, June. 2. 1886.

17 FO262/632, No.31., J. Longford to H. Fraser, Aug. 16. 1890.

曾在旧居留地从事医疗活动的欧美医师这种间接的方式，来对旧居留地的外国人实施鼠疫防疫措施¹⁸。类似的防疫方式，在1880年代中期的神户和横滨发生霍乱时也采用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居留地废除带来的制度变化，并没有对开港场的防疫方式产生影响。

日本方在采取鼠疫防疫对策时，主要是以细菌学家排除媒介动物和病原菌的方式进行的¹⁹。而在横滨和神户的欧美居留地则主要强调的是居住环境的改善²⁰。以神户国际医院的医生米勒为例，虽然当时细菌学研究急速发展，但他在撰写文章时强调的却是要通过提高生活环境的质量来预防疾病，这种基于古典卫生学的观点受到了居留地居民的支持。在居留地的欧美侨民看来，只有对他们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居留地的生活设施、居住空间进行改善，才是从传统卫生学角度上应对传染病的最佳途径。日本方实施的基于细菌学检查的鼠疫防疫对策，和关注居住环境改善的传统卫生学观点，在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事实上，日本方看似是将最新的细菌学研究成果直接应用到了防疫中，但在实际实施中由于感染途径不明也经历了不断的试错。比如，在神户和横滨的疫区实施的焚烧处理、应对霍乱时采取的下水道、厕所排水设施整修等。

6. 结语

从明治时期日本开港场的居留地制度，可以看出其在应对突发情况时存在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急性传染病的蔓延。由于应对天花、霍乱等为代表的传染病明显不属于行政管辖范围，因此防疫工作到底是由日本方还是居留地方来承担就成为了争论的焦点。这也与用防疫法令（即日本方的行政规定）来直接约束居留地的外国侨民缺乏法律根据这一背景有关。

横滨、长崎、神户的居留地在运营上各有特点。从居留地欧美侨民主导的行政自治的起止时间来看，在横滨和长崎分别在1867年和1876年就废除了自治，而在神户，则到1899年才废除，在此之前一直由居留地委员会和居留地行事局来维

18 “Sanitary Board for Kobe”, *The Kobe Chronicle*, 1899 Nov. 29, Vol. V, No.126., pp.414-415.

19 兵库县警察部编《兵库县鼠疫流行志》（兵库县警察部，1912年）、神奈川县警察部编《神奈川县鼠疫流行志》（神奈川县警察部，1910年）

20 R. S. Miller, “The Foreign Community and Plague”, *The Kobe Chronicle*, 1899 Nov. 15, Vol. V, No.124., p.386.

持相关活动。但从传染病对策的实施者的角度来看，三个开港场也存在相似之处。在 1860 年代至 1870 年代，还在实施行政自治的神户自不必言，即便是行政权已经返还日本方的横滨和长崎，也都是由居留地方自己来实施传染病防疫对策的。

开港场的防疫对策在实际的实施中，遵循的并不是居留地有无自治权这一制度规则。这是因为，在应对天花时必要的隔离、种痘技术、应对霍乱时所需的卫生工学领域的知识技术等，都属于医疗水平这一层面的问题。而在这些开港场中，掌握这些领域发言权的是居留地的外国侨民。因此，在横滨和长崎的传染病防疫中，才会出现居留地的非正式自治这一现象。

在此之后，日本方从 1880 年代末到 1890 年代，通过吸收细菌学研究的成果、在开港场设立防疫官等方式，开始介入居留地的传染病防疫。1880 年代中期，长崎成为细菌学家研究霍乱的土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此影响下，在 1899 年（明治 32 年）条约修订并废除居留地之前，横滨、长崎、神户在防疫方面便已经实现了日本方的一元管理。



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

余新忠 南开大学

摘要

将从观察当下日常生活中卫生的意象和梳理中国卫生防疫的历史入手，来探究中国近代卫生机制的性格。通过对传统卫生防疫观念和行为的梳理，来观察近代以降，中国卫生防疫从避疫到防疫、从个人到公共的历史演变。并进一步通过近代卫生性格的梳理，观察卫生的另一面。源于西方的现代“卫生”机制，不仅有着令人艳羡的代表着文明进步的“现代”的靓丽外表，同时也犹如一种无处不在的权力，时刻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作为文明进步的“现代”，除了秩序、整洁、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更小的疫病感染几率，“卫生”带给我们的还有政治和文化上霸权和权力、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和对身体自由的监控和拘束。做这样的批评和省思，不仅是希望藉此打破目前国内卫生史研究中普遍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同时也想通过这些的省思对中国当下和未来卫生建设的补偏救弊提供可以可资借镜的历史资源。进而亦希望表明，过于强调发展和强盛，而忽视民众权利的保障，长远来看，可能未必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福音。

在近代以前，中国社会虽然也有着自己的卫生行为和观念，而且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也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卫生防疫的举措和经验，但毋庸讳言，现代意义的卫生观念和由公权力介入的现代卫生防疫机制无疑是西方的舶来品。19世纪后期以降，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窘迫中，在“不讲卫生”、“东亚病夫”等国际意象的羞辱中，在“强国保种”的悲情中，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开始了关注身体、卫生，倡行和推进“现代”卫生观念和公共卫生制度这一艰难而曲折的历史旅程。即使时至今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极力追求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面建立主要源自西方的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依然是当下孜孜以求的未竟事业。从传统到近代，中国社会卫生防疫确实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近代以降，在西方文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社会逐步建立了由国家主导，立足国家强盛的现代公共卫生机制。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西方文明影响的不断深入，源于西方的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和机制日渐被视为科学和文明

的象征，并在不时爆发的霍乱、鼠疫和天花等烈性、急性传染病的直接促动下，得以引入和创建。中国改变了以往官方缺乏专门管理民众健康事务的机构和职能的局面，逐渐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掌管医疗卫生事务的卫生行政部门和专业的防疫研究机构，师法日本等国，创建公共卫生法规，开展以清洁消毒、检疫隔离、人工免疫、疾病统计、流行病调查乃至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卫生防疫措施，以及以提升民众卫生习惯和意识、改善环境卫生为基本内容的群众性卫生运动。

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个人事务的卫生问题开始变成了关乎民族兴亡的国家大事，藉由现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引建，国家成功地将原本民间的、零散的、非制度性的卫生防疫观念和行爲纳入到了官方的、制度化的体系之中，实现了民众身体的日渐国家化，以及国家职能的具体化和权力的不断扩展。虽然卫生防疫直接的目标是维护个人或民众的健康，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卫事业的建设，却明显是以“强国保种”和国家富强为指归的，甚少关注到卫生防疫中的个人权利和公平正义的问题。而且，卫生防疫举措的推行，其动因往往都不无社会、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很多情况下，诸多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在社会思潮和舆论力量的影响下，统治者为更好地维护自身统治以及表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其次，从传统到近代，社会的卫生防疫观念逐渐从消极转向积极。在传统时期，中国社会对于瘟疫的认识主要为“鬼神司疫”和“疫气致疫”两个方面，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就基本的理念而言，基本就是养内避外，除了认为巩固元气外，基本就是以避为主，大体上都是相对消极、内向的个人行为，并未成为官府介入的公共行政事务。而且有感于疫气弥漫空中，往往也无从防避，故常将染疫视为命数，并未将疫病的预防作为重点的思考方向。从传统到近代，随着近代公共卫生观念和制度的日渐引入，中国社会应对疫病的重点也开始从相对消极的避疫、治疗转向积极主动的防疫，近代的防疫除了理念上更强调预防以外，在举措上，一方面，主张通过积极改造环境卫生的方式来预防和减少瘟疫的爆发；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消毒、检疫、强制的人工检查和科学研究等手段来控制甚或征服瘟疫。

从晚清到20世纪，现代卫生防疫机制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逐渐引入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国现代制度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而言之，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首先，我们不应因近代卫生显著的现代性和外来性，而忽视传统的因素和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公权力介入并以现代科技为依托的近代公共卫生机制无疑是西方的舶来品，而且鲜明地体现了西方文明的优势和巨大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能立足史料而不是从进步和现代化之类的概念出发，就不难发现，在传统时期，公共卫生方面相关的观念和行爲，同样也存在于晚清之前的中国社会，只不过由社会力量来主持，并以个别、自为和缺乏公权力介入的方式表现出来。这至少体现在：1、近代的卫生机制中不无传统的因子和资源，在防疫观念上，戾气学说和细菌理论的结合，部分养生观念汇入近代卫生概念，在在都显示了近代卫生中的传统因子，而城市环境卫生中的粪秽处理机制的近代转型其实也是通过借助传统资源而实现的。2、当时中国社会运作的自身需求往往会影响到国人对近代卫生机制诸多内容的不同态度。比如，在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中，嘉道以降，由于城市水质污染以及传染病流行频度加大，出现了较为强烈的改善水源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

自来水这样的设施在人口众多的中心城市中也就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同时，士人精英基于城市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而引发批评和怨言，使得他们对城市卫生行政特别在意并容易接受。这些显然为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演变提供了基础和变动根据。

其次，近代公共卫生机制并不纯粹是出于维护健康之目的，同时也具有阶级性和种族性，也就是说，现代“卫生”虽然自有其维护健康的实际效用，但该制度的引入和推行显然亦非全然是以追求健康为唯一指归的，同时也是社会中存在的民族、财产和文化上等各方面的优势者，基于自身的利益，以科学和文明的名义，将相关的举措强行推行于社会整体的利益和权力秩序。

再次，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引入和展开，有助于促进都市面貌改观、卫生设施改善、感染疫病的几率降低以及国家形象的提升等，从中上层社会人士的角度来看，无疑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进步之举。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对于下层民众来说，却往往是“费而不惠”的，比如像粪秽处理等清洁制度的变革，对于普通民众不仅预示着税收的增加，而且也增加了城市周边乡民获取粪肥的成本，而所谓城市面貌的改观，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见得有特别的必要性，至少不是什么当务之急。同时像清洁、检疫等制度，在推行时，还往往会侵害民众的实际利益和身体自由。由此可见，从卫生的角度来说，近代化过程中的诸多“进步”往往都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的，而像卫生检疫，在带给中国社会主义、健康、文明和进步的同时，也有民众权利和自由在卫生和文明的名义下被侵蚀和剥夺的一面。虽然，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国家振兴等某些正当的理由和目标而牺牲部分民众的利益和自由，或许难以避免，但在推行的过程中，是否可以普通民众的权利和合理诉求置之不理，甚或将他们的诉求斥之为保守、愚昧和落后呢？是不是应对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作出更多的考量呢？答案我想不言而喻。

复次，清前期，国家对医疗卫生事务甚少介入，基本缺乏制度性的相关规定，晚清卫生行政的引建，使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逐步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介入程度的逐步加深，以及作为“国家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卫生行政的逐步建立，乃是国家职能的深化和具体化，也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扩张，虽然自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若不能意识到这些制度本身隐涵的权力关系，而不能建立起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那么政府的职能往往就能以现代化名目“合理”合法地无限扩张，民众的实际需求也就很难有必要的重视，这样一来，很多由全民买单的所谓进步和“现代化”成果，至少对于普遍百姓来说，或许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

最后，晚清以来，引入西方的现代经验，在科学、文明和进步的名义下，引入和建立近代公共卫生制度，乃是在种种的内忧外患不时突显的窘迫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尽管不无主权危机等方面外在的压力，但总体上乃是中国 100 多年前的那些士绅精英的主动而自觉的选择，是近代以来他们追求国家和国民现代化的一部分。显然，士绅精英当初如此的选择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和心态，然而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危局中，他们往往将此当作了救治中国社会和种族贫病的灵丹妙药，而很少去考虑其实际的必要性和适用性。实际上，他们其实没有多少机会和时间容他们去做那样细致的思考，为了简捷和便利推行，往往只好将复杂的情势化约为维护主权以及追求文明和现代化等简捷问题。如今，世易时移，当一份从容和优裕已相对不再是

奢望时，抚今忆昔，自然不必去苛责先人的努力和局限，但无疑有必要去尽力还原历史的复杂，让今人有机会在复杂的历史图景中，去发现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历程以及反思现代性的灵感和资源。

近代以降，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催生了“生命政治”的诞生，新的统治权力从原来的“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力逐步转变为“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而这种新的“生命政治”因为负有对民众生命和健康等责任而推动了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让政权获得干预生命的合法权力。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国门的洞开和民族危机的日渐深重，也在外力的刺激下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在这一过程中，以频繁出现的瘟疫为契机，中国逐步引入并创建了由国家主导、着眼于国家强盛的现代卫生防疫机制，成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颇为显眼的特色。虽然现有的研究往往都将瘟疫与现代公共卫生直接联系起来论述，但实际上，瘟疫只不过是契机而已，根本的动力还在于中国文明自身强大的内生力和自强精神，以及历来对于社会灾患的关注和重视，就此，我们显然无法轻易忽视中国疫病传统的意义。不过，与此同时，也须认识到，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历史背景下，时人不可能有足够的余裕去细致清理传统疫病救治的遗产，思考其与现代卫生制度的有机衔接。故而在引建中往往会凸显其“强国保种”、实现国家强盛这方面的意义，而未能较好地关注和体认卫生防疫本身具有的维护个体生命和健康权利的意义，使得晚清民国的卫生防疫具有过于强烈的政治意涵和色彩。

主要参考文献：

班凯乐：《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朱慧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南宁：广西科技出版社，2006年。

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朴彦、余新忠、姜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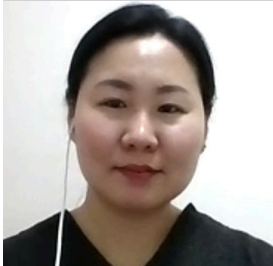
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余新忠：《真实与建构：20世纪中国的疫病与公共卫生鸟瞰》，《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演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指定讨论 1



报告点评

金 贤善 明知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2019年12月31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越过亚洲扩散至欧洲和南美洲，全世界进入紧急状态。截至1年后的现在（2020年12月31日），全球确诊病例已突破8200万，死亡人数超过180万。对于当今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和防疫这一现实问题，三位老师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作为关注传染病、防疫、环境和卫生等主题的讨论者，通过三位老师的研究，我个人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首先，从朴汉珉老师和市川老师的研究中发现，在开港场检疫方面，朝日两国都因主导权问题而发生过摩擦，这是非常有趣的部分。通过两位老师的研究，再次确认了主导传染病防疫的国家主导近代文明这个事实以及为克服传染病需要国际联合和合作这个教训。

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之下，美国、法国、英国等所谓的“强大国家”出现了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强大国家”的应对能力比想象中更加无能，对疫情完全束手无策。余新忠老师的“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让我有了结合当下疫情，重新思考近代卫生防疫意义的机会。此外，正如老师所说，这对于纠正当前和未来中国卫生建设的弊病有很大的教益。说到与余新忠老师的缘分，在华中师范大学就读时，当得知老师要来我校进行讲座的消息后，激动得觉都没怎么睡就去听了老师的讲座。由于胆小的性格，所以没能向老师要求合照和索要签名，今天能见到老师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我个人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在（中文版论文）第4页中提到：“我们不应因近代卫生显著的现代性和外来性，而忽视传统的因素和力量。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公权力介入并以现代科技相依托的近代公共卫生机制无疑是西方的舶来品，而且鲜明地体现了西方文明的优势和巨大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能立足史料而不是从进步和现代化之类的概念出发，就不难发现，在传统时期，公共卫生方面相关的观念和行为，同样也存在于晚清之前的中国社会，只不过由社会力量来主持，并以个别、自为和缺乏公权力介入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老师在现有的研究中曾提到，社会力量在开展医药局事业时，与国家及官府进行了广泛的合作。那么，在与官府合作的过程中，是否有公共权力介入或行使了与之相应的权力，对此我提出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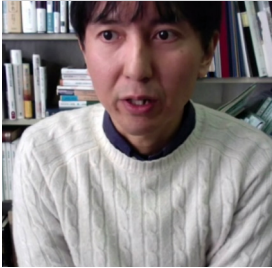
2. 在（中文版论文）第8页中提到：“（近代公共卫生）根本的动力还在于中国文明自身强大的内生力和自强精神，以及历来对于社会灾患的关注和重视，就此，我们显然无法轻易忽视中国疫病传统的意义。”传统时代的东亚，当发生各种灾害时，执政者将其视为上天对实政的谴责，从这个层面可以理解为“对社会性灾厄的高度

关注和重视”。但是以外国人的立场来看，“中国文明本身内在的巨大自生力和自强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多少有些难以理解，这让人怀疑是不是夸张地解释了这一点。

3. 在（中文版论文）第5页中提到：“从卫生的角度来说，近代化过程中的诸多‘进步’往往都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的，这是常有的事情。”对此，很想知道是否存在描述弱势群体受害和对社会不满的文集或记录。正如老师所说，不能说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是正确的。但纵观韩国目前的状况，大多数人为了形成公共利益和健康的共同体，甘愿承受一定程度的牺牲和不便。相反，在西欧，由于将个人的“自由”作为绝对价值，因此没有达成旨在实现“公共利益”的社会协议，有人认为这是导致新型冠状病毒扩散的原因之一。清代发生瘟疫时，社会力量一定程度考虑了国家的利益，我想知道当时中国民间有没有形成健全共同体的社会协议？

传染病不限于特定国家或地区，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共同克服的课题。将东亚这一区域设定为传染病相关的一个地区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通过今天老师们的研究和讨论，我们期待能够找到克服目前和今后的传染病流行的启示。

指定讨论2



报告点评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陈璐（东京外国语大学）]

点评朴汉珉先生的报告

针对传染病对策谈到的开港地外国领事采取措施，行政权和主权成为问题这一情况，与市川先生报告中提到的日本经验有共通之处，很有意思。

清朝政府的理事官和朝鲜海关税务司似乎是共同负责传染病对策的，那么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另外，市川先生报告中重点提到了近代医学，这在朝鲜又如何呢？

点评市川智生先生的报告

围绕传染病对策的主导权问题不出所料地成为了讨论的重点，不过，明确了医疗水平，也就是近代科学这一要素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日本的开港地应该有很多中国人，他们在传染病对策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

日本在接受近代医学的同时，在国内传染病对策问题上也有了掌控主导权的经验，这对日本殖民地统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点评余新忠先生的报告

关于卫生和防疫这个主题，提到了外来性和传统因素，这个论点很有意思。

虽然说卫生和防疫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但是霍乱和鼠疫这些瘟疫才更应该认为是舶来品吧。当然，19世纪霍乱和鼠疫并不是来自西方，霍乱来自印度，鼠疫来自云南省。但是疫情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势力将东亚统合进了世界市场，通过交通的革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人的移动。为驱逐疫病，卫生和防疫是那之后才引进的吧。

另外，朴先生的报告和市川先生的报告中提到的卫生、防疫与行政权、主权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是何时，又是如何被意识到的呢？

指定讨论3



报告点评

秦方 首都师范大学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会议组织方的邀请。在目前新冠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我有幸聆听各位前辈对历史中一些防疫观念和实践的探讨，实在受益匪浅。

我本人并非专长近代医疗史和防疫史研究，因此，只能就本次会议的三篇论文，提出一些粗略的总结，并结合当下疫情和防疫的发展，提出一些现实感想。

这三篇论文主题非常清晰，均是以近代中国、日本和朝鲜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为历史背景，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如何应对一些具体的疫情并推广相关的防疫观念。其中，朴汉珉教授和市川智生教授分别探讨了近代朝鲜和日本居留地的疫情扩散和防疫措施，两位教授尤其能关注不同开港口岸疫情的不同特点以及各方政权应对疫情的不同对策。而余新忠教授则探讨了近代中国新兴的国家政权和身处变革中的士绅阶层如何确立和推广文明、卫生的现代防疫观念，以及在这一推广过程中所展现的权力关系。

结合三位老师的研究，我想提出三个方面的观察和思考，抛砖引玉，向各位前辈请教。

1、区分和连结

如果允许我进行一个粗略的划分，那么近代是一个区分和连结并存的时代。一方面，近代国家民族边界确立，全球殖民扩张持续不断发展，这些趋势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区分的新单位，比如说这几篇文章中提到的现代国家、居留地等，它们代表着新的政治区分、行政区分、经济区分和空间区分等等。然而，另一方面，一些疫情的发生和传播，无疑冲击了这些人造区分。病毒或细菌依附在具体的物体或者身体上，随着在全球游走的商人、士兵、使节、船只、货物等途径也进行了扩张，疫情的爆发暴露出这些现代的、人为的区分的无效性和迟缓性，甚至这些区分反过来更促进了疫情的发展。面对区分的无效时，人们可以依托的是暂时性的合作和联系，通过分享共同的防疫知识和体制，最终将疫情控制下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又可能又会产生新的区分。

事实上，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也为我们展现出区分和连结的复杂性。当病毒成为一个全球存在时，当病毒也在进化和扩展时，我们会看到一个庞大的体系浮现，在上面有像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超越国家的单位，有各国家民族，往下的话，以中国为例，当下我们进入到精准防疫阶段，像省、市、区、甚至个人居住的小区，都成为精准防疫的有效区分单位，有时候一街之隔，按照行政区划，你所居住的小区可能就被归到疫情风险区，这种区分会极大影响小区中民众的生活范围和生活方式（比如说要居家隔离还是可以基本自由地去上班），而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疫情的

扩展也变得更为有效，于是，像机场、火车站、公交站这样的交通体系节点原本以便捷性著称，而现在则成为整个体系的弱点所在。怎样形成一个灵活、有效的体系运作，以应对疫情的突发性和非常态性，是历史和现实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2、平等和阶序

在当下的疫情叙事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对比是：一群面目模糊、仅作为数字而不断增加的“感染者”vs 一些特别有社会知名度的“感染者”。在感染这个层面，似乎是人人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感染，然而在如何叙述“感染”时，我们又强化了阶序性。如果说病毒本身是无差别的，那么如何认知病毒、防范病毒、治疗病毒，则恰恰显示了社会中的等级性和权力关系。这一点，在此次会议的三篇文章中，都或多或少地被谈论到，既有在殖民体系中的本国人和殖民者围绕防疫所形成的权力关系，也有在新的国家民族框架中不同阶层（如士绅阶层、官员）借由防疫观念再次确定自己的主导地位。这让我想到了 Susan Sontag 那本《疾病的隐喻》的观点，通过疾病，人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人们到底想谈论什么。此次疫情的爆发，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借“疫情”谈论更深刻、更复杂的问题，如国家权力、国际关系、生命权利、家庭结构等等，我想，这些议题都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进行分析和思考，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来理解疫情和防疫。

3、共同体 / 社区和非正式关系

此次三位学者的文章主要是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围绕防疫展开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我们认知历史的递进层次，即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和国家。然而，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其中加入一个环节，即共同体 / 社区，使之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这个共同体可以诸如是近代北京四合院、上海里弄这样以居住和邻里关系为中心的社区，也可以是在近代城市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的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也可以是通过近代教育和职业建立起来的友谊网络，总而言之，共同体 / 社区可以成为一个灵活的存在，甚至是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产生新的关系、体制和结构。而我之所以会产生共同体 / 社区这个观念，是看到在这次疫情中，当像学校、公司这样的组织或者机构无法成为关联个体的有效单位，甚至成为重点防范对象，我们居住的小区反而在基层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当防疫物资匮乏时，亲戚、朋友这样的非正式关系有时会成为人们获取物资的间接途径，很多人无法直接从国家或市场买到诸如口罩这样的紧缺医疗物资，那么亲戚、朋友则会形成一种有效的网络，促进物资的流通和分享。自然，我无意否认，在这其中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但这次疫情确实使我们重新反思社会和国家在体制层面——尤其是基层层面——上的运作模式。

以上是我的一些简单的观察和思考，感谢大家。

第2场

自由讨论

主持人：南基正（首尔大学）

论点整理：刘杰（早稻田大学）

自由讨论：小组成员（国史对话项目参与者）

总结：宋志勇（南开大学）

评论：明石康（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闭幕致辞：三谷博（迹见学园女子大学）

[以母语发言。翻译：日语/于宁（东京大学）、韩语/洪龙日（东京大学）]



南基正

现在开始第二部分，我是担任会议主持的首尔大学的南基正。距离马尼拉会议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很庆幸能安然无恙地再次与大家见面。从马尼拉会议之后开始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持续了一年，现在仍在进行当中。然而，在这一年时间里，东亚的“防疫共同体”还没有建立，非但未能发展出“防疫共同体”，共同对策和共同应对的努力也未取得多少进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感觉正在倒退。在新冠疫情全球化的背后，人类的全球化戛然而止，国家主义兴起，在各个国家，煽动仇视外国人情绪的假新闻也在肆意横行。截止到前天1月7日，根据牛津大学“数据中的世界”（Our World in Data）所统计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患者数据，日本确诊人数为4467人，韩国798人，中国74人。今天也有很多老师提到新冠病毒是跨越国境的存在，它使国境丧失了功能。尽管如此，掌握新冠病毒并使其存在变得可视化的依然是各国数据。所以说，我们仍然依赖于国境来认识越境的存在。在这种充满矛盾的现实世界，我再次体会到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为了继续在东亚地区生活，也为了创造和平与繁荣的未来，我们将就“从该地区的过去中应该学习什么，以及传染病再次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什么”等问题展开讨论。

给大家介绍一下会议的开展流程。首先由刘杰老师总结第一场的发言和讨论，以及9位老师（预先提交）的评论，进行论点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个小时的自由讨论。自由讨论结束后，我们将分别利用5分钟的时间，听取宋志勇老师的总结

和明石康老师的评论以及三谷博老师的闭幕致辞。

下面介绍一下自由讨论的进行方式。在自由讨论的最后，我想给刚才第一场会议的报告者每人3分钟的总结发言机会。也就是说，实际自由讨论时间只有50分钟。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自由讨论，我想明确几个原则。发言时请使用母语，自我介绍可以省略。另外，请先说明是向谁评论或者提问，所有发言请尽量控制在3-5分钟以内。还有，考虑到翻译问题，请尽可能缓慢清楚地表达论点。如果可以的话，请注意发言时间，以便所有小组成员都能进行一次发言。发言申请可以通过问答窗口(Q&A)提出，若没有问答窗口，也可以通过聊天窗口进行发言。另外，如果可以使用举手功能的话也推荐大家举手发言。

那么，首先请刘杰老师整理论点。

■ 论点整理

刘杰

谢谢南基正老师，也非常感谢今天发表的三位老师，以及为我们做了精彩评论的三位评论人。因为时间有限，我想把我听到的三位老师的发表，还有三位评论人的评论，以及我听后一些印象深刻的部分整理一下，作为大家接下来讨论时的一个参考。三位老师的发表和三个评论人的评论都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也有一些是关心比较一致的交集问题，其中，有三点是我印象最深的。第一点是各位老师、各位发表人和评论员都从各个角度提到的关于主权、行政权与现代化的问题。市川老师在他的关于日本的19世纪的防疫过程的论文中比较明确地指出，日本是透过接受西方的医学知识、发展医学技术来克服主权行政权的问题的，这一点是东亚地区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与日本通过条约改正，然后实现独立国家的过程，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接受西方的近代文明，从某些角度来看，会直接影响到传统的国家的主权和行政权的问题。而在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当中，这个主权和行政权的地位是相当高的，甚至高于关于接受西方文明文化的论述。这就让人想起中国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不单单是停留在接受西方的文化文明，它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也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国家的独立、主权与行政权的独立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观点对于如何来观察东亚地区的近代史，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另外，主权、行政权和现代化的关系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讲，就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从19世纪到现在，国家对于感染症的预防和治疗的动机与手法，应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刚才余新忠老师的讲演当中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殖民地统治的问题。感染症的预防与殖民地的统治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殖民地统治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感染症的预防问题，这个对于被殖民地统治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实施殖民地统治的日本对此采取了哪些政策？这些对于该地区传染病的预防与医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总之，这个主权、行政权的独立与现代化的问题，是三位老师都涉及到的，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传染病与跨越国境的人的移动的问题。这次的新冠病毒的状况，让我们发现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作为大规模疾病传播的一个紧急对应的

过程，每个国家都封锁了国境，限制了人的移动。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者说在走完了这第一步之后，人们开始尽量促成对信息、知识还有治疗方法的共有，或者是尽量促成跨越国境的共同的对应。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共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信息的共有往往跟主权和政治容易牵扯到一起。信息的共有和主权政治，有的时候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矛盾的问题。那么在历史上，信息的共有对于预防传染病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这对于后来的我们提供了哪些参考的价值？这些也许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

第三点是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在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的过程当中，私的（个人）网络和公的（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在这次疾病的预防过程当中，国家权力在预防，或者说在防止感染扩大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救助方面或者说在一旦发生问题之后互相帮助的层面上，更多的是依靠私人的网络。这种国家的网络和私人的网络之间缺乏了一些必要的连接部分，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社区团体的问题。在近代史上，区域间的合作，国家间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网络等，他们彼此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如何构成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这种对立和协调的关系，在疫情当中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历史上该如何去理解？或者说在这 100 年的过程中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当然，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和日本有着很大的区别。

由于时间关系，我主要把今天各位老师的发表归纳成了以上这三点，谢谢大家。

自由讨论

南基正 好的，谢谢。刘杰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建议我们围绕防疫过程中的主权、行政权和近代化问题，传染病与跨越国境的人类的移动的问题，以及预防和治疗传染病的私人网络和公共网络的问题进行讨论。如果没有人申请发言的话，那我们首先看看大川真老师今天通过聊天窗口发表的评论。大川老师今天的评论应该是与刘杰老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相关联的。那么有请大川老师。

大川真 我是中央大学的大川真。我刚才将评论的原稿从聊天窗口发给了会议的各位成员，但其他与会者看不到，所以请允许我念一下。

我想向报告者以及评论老师们提出的问题是：传染病流行与政治批判之间的关系。

“疫”的意思是由逝者的邪祟引发的疾病。特别是在东亚，自古相信因政治争斗横死的王公贵族的灵魂会化作邪祟引发传染病，作为传染病对策，需要抚慰化作邪祟的逝者的亡灵。比如，在日本，以东大寺为代表的镇护佛教、孤魂信仰等发展至今。吊唁在政治争斗中死去的逝者，可促成对现政权的一定程度的批判和牵制。我认为这在医学发达的近代早期以后也继续存在。

在 19 世纪东亚，比如余新忠老师的报告中指出民众将感染与天命进行关联性认知。从广义上讲，这可被看作是天谴论的变体。

面对此次新冠疫情，德国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认为，经济至上主义带来

的全球化与狭隘的本国中心主义加剧了疫情扩散，因此我们有必要建构新的人类观。此外，现在也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民主和自由主义。

在这样的视角下，我想向各位请教的是，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给各自的国民带来了（或者没能带来）怎样的政治意识变化。

以上就是我的评论。

南基正 好的，9位小组成员已经发来了评论。刘杰老师总结其内容提出了论点（参照P48）。如果觉得评论不够充分或有需要强调的部分，请通过聊天窗口申请发言。那么首先来听一下大久保老师的提问。

大久保健晴 我是庆应义塾大学的大久保健晴。我有一个与刚才大川老师提出的问题相关的疑问想请教大家。我要提的是与疫情的扩大给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民众的反应相关的问题。

这次共通的主题里有“社会反应”这个词，但我认为三位老师的报告中没有针对这一点进行明确的议论。

对于肉眼不可见的疫病、传染病的恐惧会在民众之间产生各种谣言和假消息，驱使民众采取极端行为，造成社会的分裂以及歧视的出现，我想就此提问。这种情况不只是现代，在19世纪时也发生过。

比如，在明治时期的日本，霍乱患者被送去避病院进行隔离。然后相关传言在民众间散播开来，像是“那些病患在西式医院里被西洋医生活体取肝，然后器官被卖到海外”一类的流言和假消息被四处散播。然后对于霍乱的恐惧变成了对明治政府公共卫生行政的反抗，最终发展成为“霍乱暴动”。

对于这种由传染病给民众带来的影响，特别是由此造成的民众的极端行为和社会分裂，在19世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各自的脉络中应作何种思考，希望三位老师不吝赐教。

南基正 很抱歉现在不能马上给三位报告者回答的机会。现在有很多提问和评论，请各位报告者记录一下提问和评论，可以的话，请把回答的内容尽量压缩，我们在最后会给时间进行发言。现在聊天窗口有人提问，请向老师进行发言。

向正树 我是同志社大学的向正树。我想就欧洲与东亚之间的关系进行提问。19世纪后半叶是日本、中国和韩国旧的政治体制崩溃、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同时我认为也是与现在的国家密切相关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的时期。

朴老师在报告中虽然没有特别提及，但是我想问在韩国的居留地是否存在被欧洲，特别是英国主导的情况。我想确认，是否可以将欧洲的医学能力理解为基督教能在之后的韩国获得支持的一个契机。

南基正 好的，谢谢，接下来是平山老师。

平山升 我是神奈川大学的平山升。刘杰老师和大久保老师在评论中提出了“信息”这个要点，与此相关，我想就东亚通过居留地媒体进行的信息传达是如何运作的这

个问题进行提问。

本次会议的一个指定点评人盐出老师已论证出，19 世纪中期以后，在东亚不同国家的居留地（比如上海和横滨等）的媒体（当时主要是报纸）之间存在相互参照和互相交涉的情况。比如，盐出老师曾在报告中指出横滨报纸上的内容在上海的报纸中有所反映。

在应对像霍乱那样的跨越国境不断蔓延的传染病时，我认为远隔重洋的其他国家的居留地的信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如果三位老师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还望多多赐教。

南基正

好的，谢谢。聊天窗口已经没有人提问了。到目前为止，很多日本老师进行了发言。也很想听听韩国和中国老师们的发言。首先有请事先发来评论的许泰玖老师，还有韩成敏老师，如果有想补充的评论，请进行发言。

韩成敏

大家好，我是大田大学的韩成敏。三位老师的报告非常有趣，从报告的共同点来看，比起应对传染病本身，三位老师更关注政治在这一过程中的介入。听报告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是传染病虽然没有国籍，但人是有国籍的。作为一个对这一部分不太了解的人，我想提一个初级的问题。在传染病扩散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防疫主权，还是不管其主导权由谁来行使，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有效防疫？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能算不上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提问，但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应该把哪个放到更中心位置的问题。

其次，即使这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即使防疫主权由相关国家行使，从近代东亚的经验来看，因医疗水平差距的问题，实际还是由西方医生主导，或者以韩国为例，在开港场实际是由日本医生主导了防疫。在这种情况下，不免会产生“所谓防疫主导权、主权问题不过是国家自尊心问题”的疑问。

最后，在听这三篇论文报告时，给我的感觉是在应对传染病问题上，都是以开港场为中心，或者以相关国家为中心，看起来十分孤立。但是，19 世纪的风土病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果。因此，我认为国家在应对这些传染病方面的合作至关重要。从欧洲的情况看，从 1851 年开始多次召开国际卫生会议，可以看出欧洲人共同应对的努力。当时东亚有没有这样的共同努力呢？至少应该建立一个关于传染病爆发时的信息网络，我想问问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的问题好像与平山老师的提问有点相似，以上就是我的提问。

南基正

好的，谢谢，下面请许泰玖老师进行发言。

许泰玖

好的，我是被指名的韩国天主教大学的许泰玖。我提出的评论并不是专业相关的，不是具体的问题。通过三位老师的论文，我再次感受到，新冠病毒这个大流行病并没有区分国籍、种族、性别、阶级差异这些历史上由人类所设定的人为区分，而是从细菌或病毒的角度出发将所有人都视为平等的宿主进行渗透这个事实。据我了解，该圆桌会议是出于缓和中日韩之间的历史对立和矛盾的意图而组织的，希望我们的圆桌会议可以像这种新冠病毒一样，成为缓和和对立和矛盾的催化剂。

今天讲到的很多关于新冠病毒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内容，各位老师应该都有所感

触。讲到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削弱全球化力量的民族主义等问题。在此简单点评如下：虽然，新冠病毒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是不经意间也为我们打开了新视野和展现出积极的一面。举一个例子来说，两年前在首尔举行的圆桌会议上，虽然大家是面对面交流，但像现在这样众人集中讨论一个主题，并且全员共同参与对话的会议似乎并不多见。这次通过使用网络研讨会这个平台，众多不同国籍的老师们共享着一个主题，虽不是刻意而为，但是我认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想听听各位老师对此有何看法。

南基正

好的，谢谢。我想再听一位老师的评论，然后结合目前所提出的论点听听大家的意见。请庆应义塾大学的段瑞聪老师发表一下意见，拜托了。

段瑞聪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样的盛会。我用中文讲，刚听了三位老师的报告和其他老师的建议，我觉得都非常好。我不是专门研究医疗卫生的，但是刚才京都大学盐出老师讲到殖民地的防疫问题。正好我两年前跟我原来的一位同事，现在在东京大学的石原あえか教授等人一起写了一本关于台湾卫生学之父高木友枝的书（『高木友枝——台湾衛生学の父』学校法人北里研究所、2018年）。高木就是刚才市川老师说到的北里柴三郎的弟子。今天三位老师讲到朝鲜、日本和中国，又涉及到了台湾，我正好去年在庆应大学的杂志《三田评论》（2020年11月号）上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我把链接放在会议网站上跟各位分享一下（<https://www.mita-hyoron.keio.ac.jp/features/2020/11-3.html>）。当然，我还是要说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日本在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占领了台湾，当时台湾民众开始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但当时日本军队的牺牲，不是因为台湾人的反对，而是因为传染病也就是鼠疫死了很多人。事实上后来到1919年，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彻底消灭了鼠疫。还有就是疟疾，这在1945年以前都没有彻底被解决，一直持续到1965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内容当然不是特别学术，杂志是北里研究所发行的，那里面有详细注释。

另外，我想向三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19世纪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各个国家的领导层、皇室是怎么被保护的？刚才各位老师都提到了普通民众，因为我有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上面有写宫内厅是怎么保护皇室的，我想了解在中国或者在朝鲜，当时皇室是怎么被保护的。我的发言就到这里，不再多占用时间了，谢谢大家！

南基正

好的，谢谢。先整理一下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的评论。很多老师追加发表了评论，还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现在谈论的传染病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各国直面近代化的时期。近代化是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运动，对于这个超越民族国家而存在的没能被国境所区分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是如何认识的呢。在我看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如防疫主权问题一样，对这个问题也是在国家层面自寻苦恼的，这在发言和评论中都有提及，这也向我们提出了在现在对这个问题应该作何解释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多发表观点，如果自己所了解的部分中有反证的话，或者像刚才韩成敏老师所提到的是否存在过共同应对的努力等，有了解的话欢

迎提出来。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我们在现实中看清这个问题，以便描绘出未来图景会很有帮助。例如，有人从媒体方面提出当时如何进行沟通交流的问题，我也想确认一下当时是否存在过相关的跨越国境的努力。

接下来，我想请报告者对目前为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首先，请朴汉珉老师发言，谢谢。

朴汉珉

各位老师就19世纪霍乱传染病的流行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很难总结到一起，我也很难对全部问题作出回答，我先回应几个能马上做出回答的问题，对于其他问题，在听过其他老师发言之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再回应大家。

大久保老师和向老师的提问与瘟疫流行对民众的影响，以及这是否与支持基督教有所关联有关，也就是关于民众应对的问题。从传统上看，朝鲜在霍乱、天花、伤寒等瘟疫流行时的应对措施基本上是先通过隔离医院（避病院）对病人进行隔离，再从国家层面分发药物或进行祭祀。这种局面在开港场建成后，随着西方医生以及日本医生的进驻，开港场附近的朝鲜百姓体验过近代医疗相关事物后发生了转变。虽然有些人因为药物有效而主动去医院取药，但也存在因为日本做肝脏等脏器买卖的传闻而引起的强烈抵抗。西方人绑架年幼的儿童，买卖眼睛或脏器，或用作药物的传闻在1888年的朝鲜也广为流传。对近代医术的反感都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我记得这不仅是在日本，在朝鲜和清朝也有同样的情况。虽然有接受的部分，也有带着反感去应对的部分，但是整体上来说，近代医疗技术比传统方式好很多，所以就存在被接受的情况。当时有很多西方医生进来，例如：艾伦（Horace N.Allen）、阿维森（Oliver R.Avison）等，国王高宗等人通过这些人的接受西方医术并且积极引进。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里。

接下来是韩成敏老师提出的，关于东亚内部有没有建立信息网络的问题。从某种角度看，这也许是今天讨论的主题，但是我不知道中日韩是否聚在一起召开过类似于欧洲方式的应对传染病的国际会议。基本上开港场内都会召开“居留地会议”或“租界地会议”一类的会议，朝鲜方面称之为“绅董公社”。英国、美国等各国外交官和朝鲜方面的官员聚在一起，就居留地的运营进行讨论。当然，很难将其视为国际层面的会议，与其说是以欧洲方式召开的国际检疫会议，还不如说是朝鲜海关为了运营，以海关为中心，召开的收集相关情报以及清朝运营事例和日本运营事例的会议。当然像海关这样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也是今天的报告中没有涉及到的部分，但是我想这一部分也应该考虑一下，就先简单说这些。

南基正

好的，谢谢。接下来请市川老师发言。

市川智生

我是冲绳国际大学的市川智生。我想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关于盐出老师提出的问题，确实曾经存在过居留地中国人相关的问题。这是个非常庞大的主题，我也曾在论文中写过。

正如盐出老师所指出的，不论是在长崎，还是横滨、神户，当时旅居日本约半数的外国人是华人居民。以来自广东、福建以及上海的居民居多。

在此基础上，在本地层面关于外交交涉这一点，即关于领事层面的关系上，一句话总结，主要是受到了清国理事官（领事）上任太晚的影响。签订《中日修好条

规》是在 1871 年，但领事就任却是在 70 年代末。

到了 70 年代末，日本的地方行政与欧美领事在外交上确立了某种程度的关系。此时，留给清国领事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了。

在此种情势下，如果要去查看有关霍乱对策的状况等，我们会发现，比如，将横浜的防疫会议的结果传达给清国领事时，领事方拒绝接受等一类的事例。

那么，居民们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居民和居留地的欧美居民，都明确认为霍乱的根源肯定是在中国。就是说，人们认为“霍乱源自中国大陆”，所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居留地的华人居民。

但有趣的是，在日本的居留地，中国人里几乎没有出现霍乱感染者。这是一个历史谜团，对此很多人在做调查。比如，就我看到的英国领事的调查记录，有报告认为“喝开水的习惯以及洗手的习惯是重要原因”。我能回答的就是这些。关于其他殖民地的问题其他老师已经回答了，我就不再赘述。

下一个是平山老师提出的关于媒体、信息网络的问题。我也拜读了盐出老师的论文，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论文。居留地的英文报纸中确实刊登了很多与上海、香港的传染病相关的信息。虽然有“在哪里出现了什么样的疾病”这一类的信息，但给我的印象是这些信息的发布是零星的，很难说是已经形成了信息网络。主要集中在 1870 年代到 1880 年代。

与此相对，我认为做到掌握信息的其实应该是英国领事的网络。关于日本国内的传染病状况，在某些时期，英国领事掌握的信息比日本国内还要详细。当然，包括上海、台湾等各个地区，英国的领事随时互通信息，其中一部分也曾提供给报纸等媒体。我认为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形式进行信息共享。我今天的报告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信息是来自于英国的领事报告以及各领事之间的信息互动。

第三点，关于韩成敏老师提出的“对于传染病有没有共同行动”的问题，自 1870 年代末期，日本向欧洲的国际卫生会议派出了代表团，以此试图追上检疫标准。然后进入 20 世纪以后，日本试图创建自己的国际框架。

有老师在聊天窗口也写道，1910 年代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鼠疫时，日本曾试图主导在奉天召开的“国际鼠疫会议”的进行。其背后的事实是当时日本在细菌学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项举措之后，日本不断发展成为在国际联盟的卫生机构中深具影响力的国家。也就是说，日本主导创建了不同于欧洲的传染病共同战线，而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举措。所以，20 世纪前半叶的传染病对策给我的印象是，它不只是单纯的对抗疾病，而是采取与外交上、或者是政治上的动机联动的形式进行推进的。我的回应就到这里。

南基正

好的，谢谢。接下来请余新忠老师发言。

余新忠

非常感谢刚才三位老师，金老师、秦老师和盐出老师精彩的评论，也非常感谢刚才第二阶段提出各种有意义问题的老师们，你们的评论和问题都给我很多启发，促进我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我能够体会到的，我可以从我个人的角度做一些回答，另外有一些问题可能还正在思考中，或者超出了我能力范围，我有可能会有所忽略。如果我回答的不够周全，或者存在问题，请大家给予批评或指正。

我想首先从三个评论人的问题谈起。首先是金贤善老师的问题，非常感谢金老

师很认真地读了我的文章，也包括此前我的书，金老师提出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这里结合自己的感受跟您做一个交流，希望您继续给予批评和指正。关于民间和官府之间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以及公权力和个人权利，这些关系的问题，您讲到您认为这里面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矛盾当然会有，不过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传统时期和近代也有很大的不同。我在报告中讲到国家力量、社会力量的时候，实际上，最主要是从传统时期的一个防疫举措出发的，基本上更多的是一种慈善性的救疗，而这个慈善性的救疗，可以是国家来展开，也可以是社会来展开，这两者之间从这个目标来讲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传统时期，慈善性的防疫工作，是国家可以做的事情，但这不是国家在法律上必须要负的责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在近代以来不是这样，近代以来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权成了国家应该担负起的责任，所以公权力介入防疫，维护民众健康成了国家的责任，在这样一种理念下，国家的公权力自然就有了扩张的理由和必要性。这样一来，所谓的国家防疫就带有一种非常强制性的力量，而这种强制性的力量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如果我生病了但想逃，那就有可能被抓起来，甚至会判处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刑，但是在过去，你想跑是没有人强制你不让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公权力和个人的权利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之间甚至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张力。实际上在防疫的过程中，这往往表现为人道和防控之间的紧张，这在现代社会表现得非常的明显，但在传统时期，因为传统的防疫是以慈善性救疗为主，所以这种张力，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

后面我想结合这个问题，也就是金老师刚才谈到的第三个问题——自由和权利的问题，谈点感受。现代公共卫生机制源起于西方，但今天反倒在我们东亚，特别是中国社会似乎运作得更好，防疫的效果更为显著，何以如此？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当然我想我们中国这次防疫的成绩肯定是要加以肯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不宜仅仅从疫病控制效果这一点出发盲目乐观，我们前面一再谈到，防疫中人道和防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张力，个人权利的保障，无论在什么社会，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防疫来说，如果过于强调个人的权利，就可能对疫病的整体防控带来影响。在传统东亚世界，个人权利的意识是比较弱的，在中国，有些大家觉得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可能西方人就会认为是对他个人权利的一种侵害，强调个人权利，对于防疫来说，显然是一把双刃剑。从西方来说，过于强调个人的权利是不是也会造成严重的比较大的社会的成本，特别是遇到疫情，它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对中国，对东方来讲，如果说我们个人权利意识相对淡薄往往有利于防疫的开展，那么这是不是也存在某种限度呢？如果公权力借防疫之机，合理合法地侵蚀个人的权利，甚至不断扩展其他权力而缺乏制约，那是不是也有警醒反思的必要呢？当然，这个两者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好或不好，但是在当前这个形势下，关注和明确这两者之间的边界，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说，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简单地笑话西方人，而是要更多反省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这是我想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关于在传统和近代的过程中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力量，以及中国自身自强的精神和内在的动力问题。我在中国研究卫生问题的时候，就感觉到其实从个人的反应，很多卫生的一些习惯来讲，在中国，或者在东亚世界，很多现代的做法，传统时期其实也是有的。但是这种作为一种由国家公权力来介入推动，或者说

制度化的防疫机制，其实是西方引进传过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用一种制度化把很多零散的或者片段的经验结合到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它原有的这些传统的力量，是会发生作用的。如何理解中国社会自强精神呢？实际上这也涉及到刚才盐出老师提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社会为什么要急切地引入这样一些东西？是不是没有仔细地去思考就认为这是一种文明，这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种科学，这是一种有利于我们现代化的手段呢？实际上这种防疫过程中强制举措，无论在西方和中国，或者在日本，都会引起人们的抵抗，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不产生抵抗就不可能，但是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的情境中，往往会把这种抵抗当作一种落后，当成一种要改进的国民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之下，我觉得可能需要我们去思考中国为什么会这样？个中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很多精英人士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贫弱和被欺辱，中国要摆脱这种屈辱，就需要发愤图强，需要学习西方，哪怕遭受一些压迫和限制，也是必须的，对于国家强大来讲是必须的。这可能就是中国人对于国家重新强大的一个迫切的愿望，或者他一个内生的动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也反映出中国自身自强的精神，这个是关于金老师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盐出老师说的有关主权、行政权的问题。维护主权是最早促进中国社会积极引入现代卫生防疫机制，开展防疫工作非常重要的动力。比如说在 1910 到 1911 东北鼠疫期间，中国非常主动地开展了以比较现代的方式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有很大的程度是担心主权遭受侵蚀。当时主导这个工作的不是民政部，是外务省，明显反映出当时防疫更多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害怕因为这个事情，俄国人、日本人会侵蚀中国的主权。而这样一种特色，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近代卫生防疫机制引进及其性格，这个在我的报告里面已经谈到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刚盐出老师讲到瘟疫才是舶来品，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但是我的想法是近代公共卫生机制，其具体的内容、具体的行为可能是原生就有的，但是作为一种总体的社会应对的机制，或者是政治的制度，显然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当时明治维新政府第一任的卫生局局长与专斋，他曾经带领代表团去英国、美国、德国访问，他到了英国之后，就感受到所谓的公共卫生等事物是当时东洋世界没有的。刚才朴老师也谈到了。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事物是西方社会才有的，当然在西方社会也不是原来就有，也是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所以公共卫生机制，总体来讲完全可以说它是一个舶来品。而从瘟疫而言，比如说霍乱，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是从南亚过来的，那鼠疫到底是从哪来的，对此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争议。此外，天花早就在大陆出现了，但中国人也认为是从南洋过来的，大约是公元 4-5 世纪左右就已经传到了中国。所以我们说霍乱是基于西方的国际贸易模式，将南亚的霍乱推向了全球，形成全球性的大流行，那当然可以说霍乱是一种舶来品。但我们需要认识到人类和传染病是共生的，所以瘟疫或者说传染病，从总体来说，它不是一个舶来品，它其实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民族，都一直存在的。同时我想我们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反省西方的近代公共卫生机制，同时也同样要肯定这样一套机制对于人类应对传染病是非常有作用的。但是到了今天，对于这个作用我们似乎还应做进一步的思考，实际上我们今天应对传染病的机制，往往将传染病当作一种意欲加以征服的敌人，因为科技的发达造成了一种征服的欲望，使得人类和传染病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和平共生，而是一种征服关系。所以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下，可能会给我们人类的未来带来非常严重

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了解的致病微生物只是地球上存在的致病微生物的亿分之一，我们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去真正地战胜这个传染病，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套卫生防疫机制模式以及有关人与瘟疫的关系的认识，都有重新思考的空间。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南基正

好的，谢谢。不知不觉到了听三位报告者最后回答的时间。还有 5 分钟就要结束自由讨论，很抱歉没能给更多人发言的机会。目前通过聊天窗口收到了很多评论和提问，大家可以予以参考，希望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最后，如果有人还有想法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可以讲出来。

朴汉珉

刚刚盐出老师提问，中间青山老师也通过聊天窗口进行了评论，是关于清朝理事官与朝鲜海关税务司关系的问题。正如青山老师在聊天窗口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近代的机构，朝鲜方面也从未正常运营过，因此基本上都是受清朝总税务司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指示派遣的税务司。但是，朝鲜方面也由相当于外务省的外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物衙门）所监督的朝鲜海关总税务司派遣税务司驻守在各开港场。清朝在朝鲜开港场也设有相当于领事的理事官，由于理事官与朝鲜海关税务司之间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所以无法直接下达指示。基本上税务司会签订接受朝鲜外衙门指示和监督的合同，在海关运营过程中很多事例都显示并不能断定其从清国单方面接受命令执行指示事项。取缔清朝商人走私红参的行为就是代表性的例子。在开港场发生霍乱等传染病时，正如本次报告内容中所显示的那样，海关税务司、朝鲜开港场监理、日本领事、清朝理事官等就如何实施检疫进行了协商，从这一点来看，很难判断任何一个国家单方面在开港场检疫过程中贯彻了其影响力。关于开港场检疫，有必要挖掘更多样的运营事例，对其中共享信息及应对措施等各个侧面进行观察。由于时间关系，此次报告只是限定性地处理了进出于开港场内日本人居留地的人员的检疫问题。从 1887 年起，虽然是临时性的，但朝鲜海关也制定检疫规则，并开始施行。我认为从东亚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就当时朝鲜海关对清朝海关或日本海关等运营的检疫规定的了解程度和接受程度，以及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部分等问题进行讨论。这不是研究者一个人所能承担的问题，今后需要通过中日韩研究者的共同研究来解决。

南基正

朴汉珉老师的网络状况不是太好，声音好像没能传过来。希望以后能以书面的方式进行分享。目前时间非常紧迫。请南开大学的孙卫国老师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孙卫国

刚才余老师讲到，我们中国在对于疫情的防控上，国家的力量是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其实跟韩国和日本一样，我们东亚三国普遍比西方要好，所以这里面会不会跟儒家思想会有一些的关系？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关疫情和全球化时代的。余老师提到的那本《瘟疫与人》书里说在公元元年的时候，全球就形成了四个疾病。那么现在疫情一爆发几乎就变成全球化的疾病，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流感，后来又有禽流感、艾滋病、非典等等，以及现在的新冠，都是世界性的传染病。原来地域性的传染病很快就变成了全球性的，那么各个国家间应该如何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种疾病，如何加强合作？这实际上是大家需要讨论的，因为从这次新冠的应对来说，

国际间的合作其实是很成问题的。我就提这两个问题。

南基正

好的，谢谢。我没有时间及能力做总结发言，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下面拜托宋志勇老师做一下总结。

■ 总结

宋志勇

发表者、评论者以及参加本次网络会议的一般参加者，大家好！首先，感谢会议组织者安排我来做这个会议的总结发言，其实我对传染病完全没有研究，实际上没有资格对刚才中日韩三国的一流学者的精彩报告进行评论和总结。在这里只是简单的谈一谈，我听了大家的发表和讨论以后的感想和体会，我想谈三点。

首先是想对主题的设置给予高度的评价，渥美国际交流财团自 2016 年以来已经举办了四届日中韩三国国史对话的圆桌会议。但是在网上举行还是第一次，我想它会载入关口全球研究会的史册。这次会议很有意义，从会议主题设定上表现出了与时俱进，关注社会需求，体现了会议组织者和历史研究者的责任感。本来根据原来的计划，本年度的研讨的主题应该是“20 世纪东亚的战争”，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已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存的时候，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所以召开这场以“19 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为主题的会议，探讨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对中日韩三国造成的影响，以及社会的应对对策，总结东亚三国过去防疫的经验教训，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社会意义，体现了我们的责任担当，我们把学术研究和社会需求很好的结合起来，我们的会议成果希望能对今天疫情的应对起到参考作用。此外我还非常吃惊，上一次在去年马尼拉会议上，朴汉珉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郭教授就提到了东亚的鼠疫问题，而且更令人吃惊的还有三谷博教授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特别提到了东亚的传染病问题，三谷教授是这样说的：“这次讨论中特别强调了传染病问题，这是个跨越国界传播的问题，还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大流行病，有人建议是否也可以研究一下各国为防止蔓延的应对措施，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这次会议让我不禁想起，三谷教授是怎样有如此远见的。

第二点，三位教授的论文发表都非常精彩，围绕“19 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这一主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韩国朴教授的“开港期朝鲜的霍乱流行与开港场检疫问题”，市川教授的“19 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病对策与开港场”，以及中国的余新忠教授“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三个报告都各有特点，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东亚三国在应对传染病方面的措施。而余新忠教授提出来的，从传统到近代随着公共卫生观念和制度的日渐引进，中国社会应对疫情的重点也开始从相对消极的避疫治疗转向积极的主动的防疫，我想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中国，日本、韩国也有相同的或相近的经历。

第三点，东亚三国在应对传染病方面遭遇了一个极为重大重要的共通的问题，那就是刚才大家都谈到的疫情防治与主权国家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已从 19 世纪走到了 21 世纪，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仍然以新的形式存在，我们从三位的发表中已经看到了，19 世纪东亚复杂的主权以及行政权的关系影响到了传染病的防治，但在 21 世纪的今天，疫情防治依然是在主权国家的领导下进行的。虽然世界卫生组织（WHO）具有指导和协调各国防疫的职能，但是它不具有强制性的

权力，效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而各国的政治体制对疫情的防治影响很大，涉及到人的生命、人权、自由、平等等重大问题，求其平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努力去做。三位教授精彩的论文发表，加上刚才讨论者的热烈的讨论，以及刘杰教授非常严谨的论点的整理，我想我们这次国史对话会议的宗旨和目的已经达到。我们的会议已经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最后谢谢会议主办方和参加者付出的巨大努力，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南基正 好的，谢谢。下面请明石老师进行评论。

明石康 我可能给不出专业的评论。今天，会议围绕着近代日中韩三个国家对于像我们三国现在正在共同面临着新型冠状病毒一样的传染病问题的各种应对，报告了非常有益的见解，并进行了活跃的评论。

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控制一下不说太多。本次会议提醒我们今后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万万不可忽视全球视野。

在今天的报告中，也有几位学者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共同的问题，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文化的思考方式可以提供不同的视野，而试图将这些不同的东西简化归纳的思考方式以及单边主义式的思考方式是不可取的，我觉得从多边的、全球化视角来探索解决对策格外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我强烈感受到，摒弃由美国的特朗普所代表的极度偏颇的沙文主义式思维，以彼此共通的方式去解决共同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武汉地区出现，中国的作家方方出版了《武汉日记》，成为了世界性的问题。她很直接地指出在武汉出现冠状病毒时中国犯下的错误。但另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出现约1年后，有人指出看上去其实欧美犯的错误更多。因此，我们在立足于各自做法的特征的同时，更要去思考可以从别国学到什么，我认为这样对于今后对抗新冠病毒会有更加积极的效果。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做法，虽说在最初有非常强烈的秘密主义和权威主义的面向，但现在看来，反倒是欧美正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像是走进了迷途一般。从东亚的视角来看，不只是中国式的做法，韩国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方面，感染者和死者人数都很少这点也十分显著。日本在防疫方面有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征目前还不明朗。日本在最初阶段试图采取日本式的做法，看上去似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现在看来，我认为日本的做法太过妥协，只能说没能呈现出什么成果便是日本防疫的特征。

因此，面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追溯历史，向过去学习。同时新型冠状病毒接下来也会持续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定程度上冲破各自国家视角的局限，更积极地向别处学习，从而在此基础上找出一个有效的、全球化的解决方案。我可能有些乐观主义，但一旦陷入悲观思维，就会难以抽身，所以需要一边向未来寻求希望，一边朝着更有效的方向不断调整我们的做法，在这个层面上，对彼此的视角进行比较分析，我认为这样的问题意识对未来以及地球非常重要。

南基正 好的，谢谢。下面请三谷老师做闭幕致辞。

■ 闭幕致辞

■ 三谷 博

今天虽然是线上形式，但会议取得的意义分量未减，我感到非常高兴。宋志勇老师的总结和明石老师的评议已经说得非常全面了，但我还想补充一点。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大流行病同时引起了“全球化问题”和“国境隔断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个问题颇有意思。

现在，各国正在推进的是这两个问题中“隔断”那一方。具体来说，就是封锁国境，在境内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这些都是疏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举措。但是，要克服这次的大流行病，仅靠隔断是不够的。

对于社会而言人类获得免疫是最重要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大量死亡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体质弱的人全部死去，活下来的人获得免疫。在这次的疫情中，有的国家接近上述情况，有的国家则不是。不过，为了避免最糟糕的状况发生，疫苗不可或缺。大家都知道，如果要开发疫苗并向全人类普及的话，就一定需要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现在这样的封闭式思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个问题。这就是我这次提出这个主题的原因。

长久以来，日常的贸易已经在进行着超越国家和跨越国境的合作，但这同时也伴随着感染传染病的风险。在美国，从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对这个领域的重要研究。

威廉·麦克尼尔曾写下了《瘟疫与人》这本著名的著作，我在十几年前读到时认为它是非常出色的研究。但是，在日本国内，当时我说“有这样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却没有一个人理解我。

而现在的状况，我认为已经迫使全世界的人们、学者们不得不去理解这个研究的重要性了。今天参会的来自韩国的金贤善老师，之前曾在上海举办的会议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并在之后向《谐振的东亚史（響き合う東アジア史）》（东京大学出版社）这本日中韩三国历史论文集提交了非常出色的论文。这次也在会上给出了很有见地的评议，对此我非常高兴。

话题回到讨论环节，这次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比起传染病的问题，大家更关心传染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特别是有很多人强调国家的作用。但也有人指出国家以外的私人网络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更加让人在意的问题，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国家或者公共机构（包括WHO）在呼吁“不这么做的话你们就会死”的时候，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人不予理睬。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多数国家都做不到通过国家来说服民众。但是，在尊重民众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中，也存在台湾那样在应对上非常成功的案例。还有2020年春季时的日本，国家只是单纯地拜托，但国民依然自发地进行配合。但是，半年多以后的现在情况却不一样了。这样的变化和不同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我认为仔细研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医学学者的工作，也是社会科学者和历史学家的任务。只是看到结果后说这边做得好，那边做得不好，这不是身为学者的人该做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以19世纪为例，可以参考这次会议上提及的开港地问题。会上询问了上海、仁川以及神户等开港地之间存在着怎

样的合作关系这个问题。对此，得出了合作不够这个答案。但是，现今世界的各个国家有笑话他们的权利吗？我认为对于国与国之间合作的不充分必须要进行深刻反思。

同时，我认为召开今天这样的会议本身，可以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或者民众与民众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国史对话”会议的初衷便是以“如何克服东亚被国境严重隔断的状况”为主题的。本次会议报告虽然按照国别进行，但却指出其中存在跨越国境的现象。甚至有讨论说存在部分的超越国家的合作，今后需要对其进行推进。这些正是因为三国的历史研究者遇见彼此，才成为了可能。虽然线上的形式存在一定的局限，但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实际上也去做了。

直到现在，传染病史在世界史中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弱势领域。我是研究政治史的，如果我现在才二三十岁的话，我一定会把自己的研究题目换到包括传染病在内的环境史领域来。

传染病以及传染病研究有一个优势，就是会迫使你使用全球化思维去思考问题。研究人类的历史，就不得不去思考与微生物以及动物等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甚至这样的研究必须去思考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希望全世界的历史学能够发生重大变化。明确地说，我已经对政治史感到非常厌倦了。虽然非常厌倦，却又不能放弃。最近发生的事件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被认为是正统民主主义的美国，发生了昨天那样的事（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暴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使得我不得不对这半个世纪以来，由人文学科中的后现代主义所引发的负面影响进行思考。

一言以蔽之，国家以及公共问题等都被置换成了揭露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对于公共问题，本来就有必要逐一进行认真思考，且这个必要性越来越重要。但是，说起作为公共问题应该思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环境问题，其中的一部分是传染病问题。

在解决历史学的这个问题上，如果本次会议能成为一个出发点的话，那我将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

我希望这次的大流行病可以成为一个“转祸为福”的机会。

我所说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原本要说的内容，对此我深感抱歉。最后请让我代表各位成员表达一下感谢。

首先，必须要感谢负责翻译和同声传译的各位。就像我刚才那样，会议中有很多超出预期的发言。对这部分发言各位也认真翻译，真的非常感谢。同往常一样，最初的感谢献给各位翻译人员。

其次，向提供本次机会及资金的渥美财团表示感谢。特别是今西淳子常务理事和新加入的三宅绫女士。我昨天听了她们的筹备会议，对她们的准备工作惊叹不已。筹备工作的内容细致琐碎，我肯定是做不到的。每次参加大规模的会议时，我都会想这个机构的工作不容易。但采用线上形式后筹备工作竟会变得如此复杂，直到昨天我才意识到。我想向促成本次会议成功举办的渥美财团表达由衷的感谢。还有，如果没有渥美财团的历届奖学生（昵称为浣熊），这样的会议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真的非常感谢。我虽是协调人之一，同时作为一名与会者，听取了大家的报告和讨论，从中学到了很多。作为听众代表，我想向各位报告人和讨论者，以及刚刚

提到的所有人表示由衷的感谢。最后，我会好好利用这次宝贵的机会，跟通过本次线上会议见到的各位建立联系，之后我会单独联系各位，将研究上的联络持续下去。

讲话有点长，再次感谢大家。

南基正

好的，谢谢。我在主持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大脑容量的局限。非常抱歉没能给更多的人发言机会。如何将已经适应了接触时代的大脑调试到非接触时代模式是我今后面临的课题。今天真切体会到了一边看着两个画面和聊天窗口一边进行主持的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局限也是留给我的课题。我们的聚会不是要在这里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要我们带着问题去讨论，并且绘制出和谁在一起对话的“地图”，希望各位能从中找到意义。非常感谢大家集中精力坚持到最后。

大久保 健晴

庆应义塾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陈璐（东京外国语大学）]

我主要从日本和荷兰的关系研究东洋政治思想史和比较政治思想。所以，请允许我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些问题。

(1) 关于主权的权力和公共卫生

在这次的新冠灾祸中，因疫情蔓延，有几位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中一本就是霍布斯的《利维坦》。正如卡罗金兹堡等人的图像研究表明的那样，在作者霍布斯的指示下，画家亚伯拉罕·博斯绘在《利维坦》中有名的扉页上，描绘了一小幅负责防疫瘟疫鼠疫的两位医生的身影。17世纪，从英格兰开始，欧洲常遭受鼠疫感染和扩散。尤其是霍布斯进入牛津大学的1603年，那年鼠疫开始大流行。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里说的，随着人们对瘟疫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主权的权力增强了其存在感，其存在的意义变得尤为突出。

这和现代社会，政府及国家权力部门以公共卫生的名义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封锁或限制人们行动自由是一样的。

公共卫生和主权权力行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疫情蔓延也是思考何为主权权力的重要契机。

尤其是这3个报告以霍乱流行为主题，考察了19世纪后半叶，也是东亚近代国家的形成期的问题。可以说，在东亚，应对疫情蔓延的公共卫生的确立和作为近代国家的主权权力的形成也是密不可分的。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关注，下面对每个报告逐一提问。

【对朴汉珉老师报告的提问】

朴老师在报告中讨论了19世纪80年代末朝鲜的三个开港场，与实践霍乱预防检疫的日本领事之间就行政权的主导权的争夺和协调问题。在讲稿的第8页，特别提到了为防止釜山港居留地传染病流行，日本官员凌驾于朝鲜人民之上进行监督和控制，这被认为是“对本国主权的侵犯”行为。因此，我想问的是，在当时的朝鲜，“主权”观念的形成和对它的认识到了什么程度？

19世纪后期，朝鲜外交被称为“属国自主”，是在原先的东亚国际秩序中与清朝时期中国的事大主义基础上展开的。实际上，在今天朴老师的报告中，作为外国登场的主要是清朝时期的中国。那么，围绕开港场预防霍乱的行政权与日本对峙的时候，当时朝鲜政府作为独立的近代国家，在主权权力的基础上是想实现多大程度的公共卫生的呢？还是说存在于其中的应该是，与朝鲜固守事大主义的清朝中国，和想通过条约外交在东亚建立新国际秩序的日本，这两者之间的外交上的拔河呢？希望您能解答这个问题。

【对市川智生老师报告的提问】

对市川老师的报告，感想和评论多于提问。如果市川老师听完这个评论，希望能告诉我您是怎么想的。

我对市川老师报告感兴趣的是，他指出在日本的开港场，当初居住在居留地的

西方列强建立了卫生会议等自治组织来应对，但北里柴三郎等人在德国跟柯霍学习欧洲尖端细菌学并把研究带回了日本，日方由此在公共卫生行政工作中实现了一元化的统治。

我的研究对象是，幕末明治时期明治政府的土木技术政策、土木工程，特别是河流和水利工程，在这些领域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有如下想法。

19世纪后半叶的东亚，上海、大连、胶州湾、广东、香港等欧洲各国的租借地，发展成为了西方列强“非正式帝国”的中转站。通过可靠的人才录用系统，从本国派遣殖民地官僚精英到那里。但是，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日本并没有成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明治政府必须自行引进欧洲各国的军事土木技术、国际港口的筑港、国内交通的整备等。于是，明治政府招聘的负责人，就是雇佣外国人。他们当中，有在全球殖民地间往来的、经验丰富的“帝国工程师”和优秀学者。另外，其中也有很多人对日本的学问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总的来说，离开自己的国家受雇于远东国家的这群人，并不是欧洲超一流的学者和技术人员。因此，到了明治10年左右，反而是明治政府派人到欧洲并在那里留学几年，掌握了西方最先进的学问技术的人员，他们的技能会更胜一筹。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里柴三郎。

如此看来，可以说明治日本向西方各国派遣的很多留学生，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法学、医学、科学技术、统治论知识，使得与在日本居留地的西方人之间的行政权争夺中占据优势，确立了主权利。也就是说，近代日本通过留学生积极接受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利用其地理偏差，与西方列强在东亚的势力进行对峙，维持了其作为主权利力的独立。

对这个的解释，市川老师怎么想呢？

【对余新忠老师报告的提问】

余老师在报告中着重介绍了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公共卫生观念的发展和卫生防疫系统的变革。余老师在研究中指出清朝前期的传统卫生观念与清末近代卫生观念存在连续和不连续的关系。众所周知，“卫生”一词来源于《庄子》，是幕末期兰学者长与专斋在近代意义上将其重读，并作为翻译词固定下来的词汇。

但我想问的是“公共卫生”中“公共”的观念。公共卫生的英文是Public Health，但在19世纪后半叶，清末的卫生行政中，怎么考虑“公共”public，以及它的范围呢？

之前说过，公共卫生行政与主权利力的观念密不可分。要了解公共卫生系统的“近代发展”，就要了解在清朝末期到底政治的主权利力具体涉及多大范围，包括西藏和蒙古在内的本国国民具体是哪些人？这个问题也与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形成有很紧密的关系。关于这点，我希望能听听余老师的见解。

(2) 公共卫生和民众的反应

第二个论点是，对政府通过行使国家权力实施公共卫生行政，民众有什么反应？例如，在明治时期的日本，霍乱患者被隔离到避病院。对此一时间流言四起：“患者们在西洋医院被那里的洋医生活生生取出肝脏，其内脏器官被卖到海外”。由

此，对霍乱的恐惧与明治政府的公共行政和对西方人的敌视关联在一起，爆发了霍乱起义。

像这样，对无形的疫病传染病的恐惧产生了各种谣言和假新闻，它驱使民众走向极端，在人们之间形成分裂和歧视。这在现代社会中也很常见。

这次的共同主题中有“社会对策”一词，但我想三位报告者都没有明确在报告中提及这个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各位报告者能再谈谈 19 世纪朝鲜、日本、中国各自的传染病流行和防疫对策，民众中的反应，以及政府和学者对此做出的应对。

向 正树 同志社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东京大学）]

三位老师的报告均描绘出了各国之间通过超越国家和地域屏障的合作共同对抗霍乱的样貌，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历史性发掘。但另一方面，霍乱的威胁也强化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区隔，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界线。这次的新冠疫情也一样，存在众多超越国家的合作关系（欧盟圈中接收医疗系统崩溃国家的患者）的同时，也在各个层面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区隔（比如在欧美发生的歧视亚裔现象等）。

19 世纪末正是中日韩三国形成延续至今的民族意识的时期。关于日本、中国、韩国的民族意识的形成与霍乱流行之间相关性的可能性，我想请问各位老师有何见解？

比如在日本，我认为大家间接看出了霍乱的流行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相关性。日本明治时期，以原福冈警察署长汤地丈雄和西洋画家矢田一啸为中心推进了在博多设立“元寇纪念碑”的计划，并最终于 20 世纪初完成。汤地等人活动的目的之一，是试图通过唤醒人们对过去所谓“蒙古袭来”的历史记忆，提高对外国的危机意识，从而强化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汤地脑中所想的是当时持续建设先进海军的清国。在此过程中，1886 年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长崎事件（在长崎上岸的清国水兵与当地警察之间发生的事件），二是博多爆发霍乱。作为福冈警察署长，汤地负责应对霍乱，看到很多人因感染霍乱而倒下，他想起了以前博多被“蒙古袭来”时的情形，决心开展“元寇纪念碑”运动。但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有汤地那样的感受，很多日本人对“元寇纪念碑”运动态度冷淡。矢田很是赞同汤地的想法，他画的油画《蒙古袭来绘图》被有效利用，在全国范围持续行脚募捐，最终于 1904 年建成了“元寇纪念碑”。通过此运动，日本国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被激发、加强。

平山 升 神奈川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东京大学）]

(1) 传染病 = 一个必须超越“国史”的主题

传染病给人类带来了众多困扰，但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竟如此有趣。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三位老师的报告呈现出了以近代国家（此处为日本、中国和韩国（朝鲜）三国）为框架的理解所无法展现的历史样貌。

朴汉珉和市川智生两位老师的报告明确了以下事实。在朝鲜中央政府尚未制定出统一的开港场防疫规定的阶段，各开港场的外国官员、本地官员以及居留民社会之间，因协作关系的状况各不相同，结果应对状况各异。正因如此，从在应对传染病现场开展的超越国家的协作这一点上来看，比起“日本的开港场 VS 朝鲜的开港场”之间的差异，“横滨、神户、长崎、元山 VS 仁川、釜山”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

而且，虽同为日本领事馆，因未与朝鲜官员方面事先协商便单方面制定规定而引发摩擦的釜山日本领事馆，与实现了同朝鲜、清国协商合作的元山日本领事馆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异。

通过二位的报告，我认为可以看到19世纪东亚的开港场在直面未曾经历过的传染病应对问题时，比起日本、朝鲜、清国这三个国家的制度框架（居留地制度等），各开港场的人际网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层面的个别要素起到了更大的作用。19世纪应对传染病的历史让我深切感受到“即使不情愿，也必须要有超越国史视野”。

此外，余新忠老师这次的报告从宏观角度做了概述，未涉及中国特定开港场的具体事例。我想问个问题：中国各开港场当时是否也如朝鲜和日本一样有过比较大的差异？

我还想向三位报告人请教，在东亚通过居留地的媒体进行的信息传达是如何运作的？盐出老师作为本次会议的讨论者，他已经论证了在东亚各国不同居留地（上海-横滨等）的媒体之间存在相互参照和议论的连环现象。在应对如1886年霍乱那种跨越国境不断蔓延的传染病时，其他居留地的信息是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从各传统社会的价值观看，“感染致死”意味着什么？

余新忠老师在报告中指出，“往往亦将染疫视为命数，并未将疫病的预防作为重点的思考方向”、“我们不应忽视传统的因素和力量”，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按照现在的价值观，“感染致死”应该是“要尽力避免的事”。但在现代科学和医学广泛成为包括普通百姓在内的人群“理所当然的规范”之前，是存在不同世界观的。我认为有必要对“传统（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传染病对策的相遇及相克进行思考。虽然写成“传统（前现代）”，但并不是说那种价值观与现代的世界没有关联。

我介绍一下日本的事例。我现在研究的是日本新年初次参拜（新年参拜）这个习俗。今年的新年因为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在战后首次出现了参拜人数锐减的状况。但是，大约100年前“西班牙流感”爆发的时候，却跟往年一样，大量人流涌入神社寺庙进行新年参拜。在新年期间以外，也发生了“前往寺庙祈求不要感染西班牙流感的人挤爆电车”的状况。虽然当时政府和知识分子已经根据近代科学给出了戴口罩和避免聚集等预防对策，但大多数百姓并没有遵从这类指示，而是选择了去寺庙参拜，哪怕会引发群聚风险也要去。“生病了就去祈祷、祈福”的传统行为模式，以及当时婴幼儿的高死亡率等使得“死亡”成为一种日常，这些都是造成人们这么做的原因。

我认为，抛开现代的成见，以历史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的来说，“感染致死”意味着什么，这对历史学来说也是很有必要的。

许 泰玖 天主教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第五届“中日韩国史对话可能性”圆桌会议将以“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为主题召开。在本次会议上，朴汉珉老师、市川智生老师、余新忠老师提交的论文，让我对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新冠病毒大流行（Pandemic）状况有了很多感触和思考。跨越国境流行的致命性传染病，在开港场、开港地这一特殊空间里引发了卫生、防疫与行政权、主权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在我看来很有意思。在探索传染病的克服与应对这一主题时，需要同时考虑一个社会的传统要素和近代要素的论点也非常有意思。最重要的是，引发传染病的细菌和病毒，超越或者削弱了历史上由人类所设定的所有人人为的区分和差别——国境、人种、民族、贫富的界限，其结果是带来了共同的应对，这一点值得关注。反过来讲，在细菌和病毒的眼中，所有人类只不过是一个个平等的宿主而已。希望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全球研究会（SGRA）持续推进的圆桌会议，能成为削弱或缓和中日韩历史对立和矛盾的催化剂。

段 瑞聪 庆应义塾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 宁（东京大学）]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重大危机。如何度过这次危机事关人类社会的未来。在此我想谈几点个人拙见。

第一，各国不仅需要在本国遏制疫情扩散，还需要防止疫情向他国蔓延。为此，各国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备受挑战。而我们每个人也需要对自己的行动时刻保持留意。

第二，在疫苗开发等工作中，国际合作与全球信息共享不可或缺。这是真正关系到人类社会安全保障的问题。

第三，要时刻对战斗在第一线的医疗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心怀敬意与感激。

第四，消除对感染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歧视，积极向其伸出援助之手。

第五，需要正向思考（positive thinking）。由于疫情人们的出行受到限制，但与此同时，Zoom等网络工具的使用，使线上授课得以实现，也让与其他地区或国外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简单。远程办公减少了纸张的消耗，从结果上看，会减少森林砍伐，从而有利于环境的改善。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新冠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它让人们暂停脚步，开始思考如何与自然共生。

孙 卫国 南开大学

非常高兴能够再度参加渥美财团组织的中日韩三国国史对话会议，本次主题是“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尽管是网上参会，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次对话会议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本人尽管对医疗疾病史并不在行，但对于大家的论文还是非常感兴趣。拜读三篇主题报告之后，结合时下的新冠抗疫形势，谈几点个人看法。

第一，时当新冠肆虐的当下，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当其时。而三篇主题报告恰好

又都是讨论中日韩三国由传统过渡到现当代时期，在三国所发生的疫情及各自的应对。尽管余新忠教授讨论的问题更为宏观些，而朴汉珉与市川智生两位先生则都是讨论 19 世纪后半期朝鲜与日本应对疫情的做法以及政府的应对办法，讨论的问题都有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在面对疫情威胁时，三国在社会机制方面的变化及其效果。其中涉及很多问题，医疗技术、政府管理、社会动员等方面，为我们当下应对新冠疫情，提供很多可以参照的因素。

第二，从三国近代应对疫情来看，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医疗技术，或者药物等方面，反而可能是社会应对的机制，国家动员的力量。瘟疫的流行，跟一般的疾病还是有很大不同，因为其流行快，致病广，相对于“治病”来说，“预防”更为重要。如何调动社会的力量，尽可能将疫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至于迅速扩大，是抗疫成功最为关键的办法。无论是发生在仁川的鼠疫，还是发生在日本各港口城市的瘟疫，都是如此。在当下面对新冠大流行的时代，我们身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看到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像美国、英国、法国等，在预防方面做得都很不成功。中国吸收早期不够重视预防的教训，经过几个月的严防死守，加上积极而有效的治疗，终于将其控制住，充分说明预防、隔离是阻断瘟疫流行最有效的办法，绝不可以麻痹大意。

第三，在三篇主旨报告中，当东亚三国在近代面对疫情之时，在现代防疫体系建立过程中，都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各国是东亚三国的老师，是被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而当今在面对新冠疫情之时，东亚三国的处理办法普遍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好，这样也就带来一个新的思考问题，影响这种差别的具体原因何在？是否跟儒家注重集体利益，在面对大是大非面前，更能够牺牲个人自由以服从更大的需要有关？还是有其它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

第四，三篇主旨报告，都是以国别为单位讨论的 19 世纪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但从其中我们也看到日本与朝鲜的关联性。在地域性的传染病防治中，动员一个地域、一个国家即可以。但诚如威廉·麦克尼尔说过在公元纪年开始之际，全球就形成了“四个疾病圈”，而在全球化的当下，随着交通的便捷，地域性的传染病能够很快就形成全球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流感、随后的禽流感、艾滋病和当下的新冠疫情，都是这样世界性的传染病，在防治过程中，如何加强国际性的合作，更是成功与否的重要一环。

最后，借用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最后一段话说：“假如我们能像了解过去那样，努力地预测未来，那么，对传染病的影响就绝不能置之不理。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存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这似乎是个预言，当下全球性新冠疫情的蔓延与肆虐，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也充分说明如何应对传染病的爆发与流行，将伴随着人类的未来，相信人类最终会战胜新冠疫情。即便如此，今后还会有新的疫情发生，关键是如何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预防体系，而且这种预防更具有国际性，各国如何有效地合作，更是防止这种世界性传染病的关键。

注)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1700 年—》，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第 237 页。

彭浩 大阪市立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在回顾流行性传染病的历史时，中世纪后期流行的鼠疫作为广为人知的事例经常被提及。在欧洲，威尼斯、马赛等人口流动性强的港口城市和商业城市是最容易被感染的地区。防疫对策上，不得限制人们的出行，但因与内陆城市和农村地区相比，港口和商业城市对人们外出的依赖性很高，在尽可能降低感染风险的前提下，想尽一切办法制定可允许人们外出的防疫对策。在此背景下，14 世纪后期，在各大港口城市，对来自感染地区的航船开始采取隔离一定时间的措施，期间不可下船。这被认为是现在的入境检疫制度的起源。此外还导入了发放证明移动者为来自非疫区的健康证明书（Health Pass）的制度。健康证明书的广泛使用被认为是后来的近代护照制度的导入提供了有利条件。

那么，我想从制度革新的视角进行提问。听了报告后，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就是 19 世纪后期霍乱在东亚的流行对日本和朝鲜的检疫制度的生成，或者换句话说，检疫制度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想确认的是，是否可以将当时的霍乱对策看作是促成中日韩三国检疫制度创立的契机。以及，当时在创立制度时，是否存在移植或参考其他国家制度的情况。如果有具体的实际例子，希望能举例说明。

八百 启介 北九州市立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于宁（东京大学）]

市川老师和朴老师二位的报告都谈到了居留地与国内社会这个二元空间。我认为当时在亚洲“直面霍乱”就等同于“直面近代或者欧美”。从市川老师的报告出发理解日本与朝鲜的一个不同之处，便是在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从结果看，日本成功了而朝鲜却没有。如果这么说的话，我想问，日本积极的防疫对策是否使得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变得更容易？

朴老师的报告对仁川、元山及釜山三地不同的防疫状况进行了考察，在仁川，日本领事虽与其他各国领事馆达成协议，却在制定预防霍乱的检疫规定时没等国内颁布训令，在元山，朝鲜、清国以及日本三国的官员在检疫规定方面实现了良好的互助合作，而在釜山，日本领事馆未与其他各国的领事馆进行协议径自施行了检疫规定。与 1895 年的乙未事变以及 1928 年的皇姑屯事件等“当地的暴走”之间的关联颇有意思。但是分析主要是根据日本的外交史料展开，因此我认为是否可能存在夸大了日本官员应对行动的问题。

近代是国家开始通过“卫生”对国民身体进行支配的时代。虽然，余老师的报告认为在近代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统治关系中卫生防疫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又与奥武则以及福士由纪的有关中日“医疗逻辑”与民众的“传统社会伦理”之间对立关系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在亚洲，“传统治疗”与“近代卫生制度”之间融合的可能性，是否可以说仅限于中国？我对此留有疑问。

郑洁西 宁波大学

我对朴汉珉先生的大作比较感兴趣，特别是 1886 年仁川港的临时检疫规定在日本的行政程序感兴趣。这里看起来像一个现代的行政审批程序。我根据论文将这个程序梳理了一下，不知道是否有理解错误的地方。在此基础上我想提几个问题。行政程序是否包括这 7 个步骤？（1）仁川日本领事和各国领事会议，制定临时检疫规定，（2）该临时检疫规定先提交仁川海关长（代理）史纳机，史纳机同意，以“海关长公文”形式即行生效，（3）仁川日本领事将检疫规定向居留仁川日本人公示，即是立即执行该规定的意思，汇报本国将于 7 月 15 日实施应该是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追加认可的意思，（4）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在此次制定、实施检疫规定时的影响或作用如何？仁川领事铃木充美是必须经由高平之手方可将检疫规定上达外务大臣井上馨，还是仅需参考高平意见而直接将检疫规定上达井上？（5）外务大臣井上馨提出的以公使之名义颁布和实施检疫规定的处理方案，事实上是认可该检疫规定，（6）日本内阁最初也是同意了井上馨的方案，亦即大体上同意了该检疫规定，（7）但问题出在内阁发训令给公使执行时，仁川方面其实已经下令执行。最终的结果是，日本内阁虽然同意了检疫规定，但因为仁川方面在实施方面过早执行该规定，系“越权”行为，是否是该“越权”行为引起日本内阁“不快”，使得内阁出于“面子”原因而撤销对该检疫规定的承认？

霍乱是急性传染病，犹如突然爆发的战争，将军在外面打仗时尚且“君命有所不受”，霍乱发生时，相关的责任人（譬如仁川领事铃木充美）必须迅速应对方能掌握主动权，事实上铃木在当时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日本政府的这套层层上达、下传的复杂行政程序，在时效上无疑有其弊端，而其最终撤销对该检疫规定的承认，似乎也有不近人情的地方，不知道后果如何？日本内阁对这场霍乱的大流行是否负有一定的责任？

还有一点，日本内阁撤销对检疫规定的承认，是否是日本官僚系统的特色？还是当时各国政府的普遍情况？同样是关于该临时检疫规定，在仁川的日本领事、清国领事和美国、英国领事均达成了一致，认为应该马上付诸。不知道后来在清国朝廷和美国、英国内阁是否发生过如同日本一样的问题，即因为执行过早而不被追认？

第 5 届 国史对话会议报告

——在传染病时期回顾传染病历史

金 因泰 全南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陈 璐（东京外国语大学）]

2021 年 1 月 9 日举办了“第 5 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此次会议主题是“19 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从去年 1 月在菲律宾召开的第 4 届国史对话会议结束为止，不，COVID-19 肆虐后，谁也没预料到这次的危机会持续到第二年 1 月。第 4 届会上三谷博老师提到 19 世纪东亚传染病的主题，可能就是先见之明，这也成了符合这个时代的讨论主题。

这次对话是在网上举办的。从技术层面上找到了在这场危机中也能继续对话的方式。但是，在享受这种便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工作人员为了让大家都顺利利用新形式对话做足了准备。对话正式开始前进行了很多预演，当天也从早上就开始准备。我想再次感谢事务局为我们与会者做出的充分准备。

迄今为止每次会议都会邀请许多演讲者和讨论者，召开为期 2 至 3 天的研讨会。但是，这次会议只从各国各请一名演讲者和讨论者，确保了会议的集中度和效率。不同时间段上虽然人数有变化，但据统计论文报告人、讨论者和小组成员共 38 名，一般参加者 93 名，同声传译等工作人员 20 名，共计 151 名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两场进行。第 1 场由村和明老师主持进行了 3 个主要论文报告和指定讨论，第 2 场由南基正老师主持自由讨论。两场结束后还举办了与会者自由参加的线上联欢会。

第 1 场开场是渥美财团常务理事今西淳子女士的欢迎致辞，之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赵珖老师致开幕辞。赵珖委员长说 19 世纪疫情大爆发的相关研究将为当下 21 世纪，也就是后疫情时代（Post-COVID19）下展开的新“国际”问题提供一个解决规范。并且表示了希望国史对话会议继续办下去的愿望。

第一个报告是由朴汉珉老师（东北亚历史财团）带来的“开港期朝鲜的霍乱流行与开港场检疫问题”。主要谈到釜山、仁川、元山等朝鲜初期的开港地霍乱流行，检疫因此受到了困扰。3 个港口与各国的国民保护呈现出相反的利害关系。朝鲜政府之后积累经验，于 1887 年制定朝鲜政府检疫章，一直沿用至 1893 年。

第二个是市川智生老师（冲绳国际大学）的报告“19 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病对策与开港场”。市川老师说他很惊讶与朴老师有相似的主题和问题意识，期待能对彼此的研究有所帮助。此次报告以日本开港场横滨、长崎、神户为对象，集中讨论了日本人社会和外国人社会的关系。经过混乱的时代，直至 1890 年代后日本政府才实行了传染病对策的一元化。

第三个是余新忠老师（南开大学）的报告“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

与前两个报告不同，这个报告是从宏观角度看卫生在中国的意义和实际情况，以及近代以后的变化。另外，通过与当下疫情的比较，提示出与国家、地区、个人作用相关的共同思考的主题。

接着，是对3个报告的指定讨论。指定点评人也由这3个国家的研究者组成。（分别是明知大学的金贤善老师、京都大学的盐出浩之老师、首都师范大学的秦方老师）。指定讨论没有“指定”某个报告内容作为讨论对象，而是讨论此次所有的课题，展开了更广泛的讨论。讨论者指出了，传统卫生防疫的含义、近代以后国家开始主导防疫的过程、传染病带来近代化的同时伴随出现的无形的划分、以及围绕卫生和防疫由哪个国家主导的竞争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有必要留意关心殖民地的卫生和防疫问题，以及国家以下的单位、连接国家和底层的共同体的问题。

第2部分是自由讨论。在自由讨论之前，刘杰老师（早稻田大学）整理了论点，刘老师在整理各个报告内容的同时，还整理了事先由小组成员提出的问题中的共同问题。应对跨境人群传播的传染病，首选方法是国家封锁边境，这关系到主权问题，但此后的信息共享和跨境应对成为了重要课题，国家-地区-个人的联系、社区的作用对预防和治疗工作都至关重要。另外，发言中刘老师还指出如何理解其中的共存性和对立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接下来是小组成员的评论和提问。其中不仅有直接发言的，也有利用聊天功能提问的。传染病自古以来就易引起对当权者的不信任，因此近代以后传染病仍与国民的政治意识及其变化密切相关。其中，主权与传染病之间的力量关系、各国民众的意识和民族主义高涨的关系、传染病流行时三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共同应对的情况等，都成为提问的焦点。对此，报告人认真作答，指定点评人和小组成员相继补充评论，以致时间都不太够。

自由讨论环节之后，宋志勇老师（南开大学）进行了总结，明石康老师也做出了评论。这是值得载入历史的围绕恰当主题的“对话”，是让我们思考全球化中各国的社会责任、该传播什么样的社会信息的时刻。在总结评论中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各国可以更自由地从相互学习的立场上寻找解决方案，因此互相比较分析对方的观点是这个聚会的初衷，这无论是对未来还是对地球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谷博老师（迹见学园女子大学）在闭幕致辞中讲到了以下四点。①不能因大流行病的事态而再次分裂或扩大分裂 ②期待这次会议能成为国家-民众-学者之间展开合作关系的重要契机 ③“国史对话”的宗旨是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尽管网上会议有所局限，但是这次会议完成了重要的对话 ④希望这次的会议能成为跨越历史学界限的出发点。最后，向翻译和同声传译的各位工作人员，以及渥美财团的奖学生们表示了感谢。另外，还表达了希望今天参会的大家除了会议以外，在个人层面，今后都能一直保持交流。

会议结束后，还以联欢会的形式举行了非正式的自由的“聚会”。我时隔一年和在菲律宾召开的“第4届国史对话”会议上见过的各位重逢，非常愉快地进行了对话。第一次参加“第5届国史对话”的各位也很快熟悉了起来。不生硬的共同主题，自备的饮料和下酒菜，像这样在网上见面不也很好吗？因篇幅有限，我很遗憾没能充分介绍参加会议的各位的发言内容。

（转载自：国史邮件杂志“Kokushi Email Newsletter #27”）

第 5 届 国史对话

——在传染病时代，回顾传染病历史

金 贤善 明知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洪 龙日（东京大学）]

由于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的缘故，2021 年 1 月 9 日“第 5 届中日韩国史对话的可能性”会议以线上方式举行。起初对线上会议的方式感到担忧，但中日韩三国学者还是很顺畅地就 19 世纪传染病流行和防疫的问题进行了报告和热烈讨论。同时，超过 100 名的普通参会者进入网络会场，实时在聊天窗口提问交流。正如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赵珖在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对线上进行的本次国史对话应该赋予另一种意义。首先，向在新冠疫情危机中，为全新方式的会议的顺利进行而竭尽全力的相关人士表示感谢。

反面教训

2020 年新冠疫情在韩国扩散前夕，曾经有人问我：“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研究传染病和防疫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当时，确诊患者的移动路径会即时传送到我们的手机提醒我们注意，且通过已经准备充分的诊断工具，确保在人们出现疑似症状时，能迅速接受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对研究传染病和防疫历史对我们的生活有何意义这个问题产生怀疑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对于研究疾病史的我来说，这一提问一度令我内心很不舒服，并开始思考应该如何回答，而国史对话犹如寻找对这一问题答案的旅程。

在被称为“大流行病（Pandemic）”的危机状况之下，国史对话围绕着足以载入史册的适当主题进行了报告和讨论。最先由朴汉珉老师（东北亚历史财团）报告了主题为“开港期朝鲜的霍乱流行与开港场检疫问题”的论文，接着市川智生老师（冲绳国际大学）报告了主题为“19 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病对策与开港场”的论文。两位报告者非常生动有趣地介绍了 19 世纪时朝鲜和日本传染病流行的状况及在开港场检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家间的摩擦。对两篇论文的内容，不仅二位报告者本人，作为点评人的盐出浩之老师（京都大学）也表示十分惊讶，因为彼此研究的领域之间有着非常深的关联。能在一个空间听取并比较朝鲜和日本两国在开港场检疫问题上的相似经验及其不同方向的发展，得益于将中日韩三国研究者聚在一起的国史对话，是它使之成为可能。

中日韩三国学者分别进行了报告，报告内容中均包含传染病这一跨境现象及为了克服这一现象的国家间的联系。其中，学者们尤其关注 19 世纪传染病流行时，三国之间是否像欧洲一样进行过国际合作。在最后的闭幕致辞中，三谷博老师（迹见学园女子大学）再次阐明要想克服传染病，就必须进行国际联合协作的历史教

训。并提到，国史对话召开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学者和学者之间的交流，还在于其也成为国与国之间、民众和民众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契机。这句话给今后继续研究疾病史的我带来“合作”这一重要课题。

之后，余新忠老师（南开大学）通过当今的卫生形象和中国卫生防疫历史，讲解了中国的近代卫生系统及其性质。虽然是通过网络，但是能见到一直非常敬仰的余新忠老师，并能参与讨论老师的论文，作为新进研究者的我深感荣幸。最近，在被称为“发达国家”的国家，其确诊患者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使我对现代意义上的防疫和西欧的体系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老师的报告将我从日渐偏狭的想法中唤醒，在多角度思考防疫意义方面为我带来了启发。此外，点评人秦方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对连接上层和下层结构的共同体的观点以及盐出浩之老师针对日本居留地的中国人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等深层次的讨论，对我而言都是意料之外的收获，受益良多。

报告结束后，刘杰老师（早稻田大学）就与传染病相关的主权、行政权和近代化问题、传染病与人或事物的移动以及预防治疗传染病的私有网络和公共网络等问题对报告内容进行了论点整理。随后，与会者开始提问，主题包括传染病对民众和基督教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在东亚通过居留地的报纸等媒体传达的信息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是否像欧洲一样召开过国际检疫会议、新冠病毒带来的积极影响等，众多提问和讨论接连不断。这些有深度的提问为拓展思考提供了契机。

转祸为福

美国前公共卫生局局长威廉·斯图尔特（William H. Stewart）曾在1969年召开的议会的演说中宣称：“传染性疾病现在大部分都能看到尽头。”20世纪科学和医学的发展使人类确信在与传染病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现实是，21世纪人类仍然饱受传染病之苦，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新型传染病不断出现。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我们遭受了非典（SARS）、甲型流感（H1N1）、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以及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等传染病的威胁。每当发生疫情时，世界各国都会迅速研发疫苗，但病毒以更快的速度变异，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在被称为“生物炸弹”的传染病面前，我们无法向科学寻求所有的答案。国史对话回顾了过去各国所采取的防疫措施，确认了历史的作用，即寻找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问题的解答，历史的这个作用十分明确。

因环境破坏、气候变化、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传染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当大多数人幻想传染病已被扑灭时，学者们仍在警告传染病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流感病毒的流行不在于“是否”发生，而是“何时”发生。不知何时会再次袭来的传染病，与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一同成为需要全人类共同关注并克服的课题。正如宋志勇老师（南开大学）和明石康老师指出的那样，面对传染病等人类共同的问题，我们应该通过过去，以全球化的视角和多国主义的思考来摸索解决方案。国史对话让我们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信息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为将来随时可能到来的另一场危机树立了典范。

报告结束后进行的“联谊会”的时间也非常有意义。因为是首次参加国史对话，对我来说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是新面孔，但是因为对学术的好奇心和热情，我依然与各位学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那段经历超越了联谊这一单纯目的，成为了

我个人学习的宝贵时间。按照三谷博老师的要求，我将继续与通过本次机会认识的研究人员保持交流，加强合作。

在结束本篇前，向为扩大学术场域并支持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而一直不遗余力地努力着的渥美国际交流财团表示由衷的感谢。

（转载自：国史邮件杂志“Kokushi Email Newsletter #29”）

第5届“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圆桌会议 参会记

平山 升 神奈川大学

[原文为日语。翻译：谢 苏杭（千叶大学）]

(※ 本文为笔者于参加标题所示圆桌会议次日，在个人 Facebook 账号上发布的文章。)

昨天（2021年1月9日），我有幸参加了在 Zoom 上举办的第5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圆桌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中日韩三国的历史研究者就近代史中的传染病，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报告。

- 朴 汉珉（东北亚历史财团）“开港期朝鲜的霍乱流行与开港场检疫问题”
- 市川智生（冲绳国际大学）“19世纪后半叶日本的传染病对策与开港场”
- 余 新忠（南开大学）“中国卫生防疫的近代演变与性格”

虽说传染病对于人类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困扰，但如果将其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来看待，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东西了。而促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的原因，是我从三位老师的报告中，看到了一个以诸如日本·中国·韩国（朝鲜）这样的国家框架作为其基础的历史理解所完全无法展现的历史样貌。

市川智生以及朴汉珉两位老师在报告中指出，朝鲜中央政府还没有制定与完善统一的开港场防疫规定的阶段，在各个开港场，外国官吏与当地官吏、居留民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非常不同，从而导致了传染病对策的实施状况也大相径庭。正因为如此，从实施传染病对策的现场中产生的跨国界合作的这一视角来看，在传染病对策的实施问题上，与其说是“日本的开港场 VS 朝鲜的开港场”之间国别上的差异，倒不如说诸如“横滨、神户、长崎、元山 VS 仁川、釜山”这样的开港场之间的差异要更为显著。

实际上，即便同为日本的领事馆，在事前未经与朝鲜官员方面的协商就单方面地提出规章制度从而引起摩擦的釜山日本领事馆，与促成了同朝鲜和清王朝之间的协议、互助的元山日本领事馆之间，具体情况也大为不同（中央政府甚至发布了“学习元山领事馆的做法”这一训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东亚的开港场在直面从未经历过的传染病应对问题时，与其说受到诸如日本、朝鲜、清王朝这些国家所制定的制度框架（居留地制度等）的影响，倒不如说，各个开港场的人际网络、医疗卫生的基础设施之类的个别因素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余新忠老师（南开大学）在报告中提出，“往往亦将染疫视为命数，并未将疫病的预防作为重点的思考方向”、“我们不应忽视传统的因素和力量”。对于这两个观点，我深有共感。

以上观点让我想起了大约 100 年前发生的“西班牙流感”。由于新冠病毒的原因，今年日本的正月初诣人数经历了日本战后以来的首次大幅度减少。然而，大约 100 年前的“西班牙流感”时期的正月，日本的神社、寺庙与往常一样热闹，聚满了初诣的游客。甚至还发生了“前往寺庙祈求不要感染西班牙流感的人挤爆电车”的状况。虽然当时政府和知识分子已经根据近代科学给出了戴口罩和避免聚集等预防对策，但大多数百姓并没有遵从这类指示，而是选择了去寺庙参拜，哪怕会引发群聚风险也要去。“生病了就去祈祷、祈福”的传统行为模式，以及当时婴幼儿的高死亡率等使得“死亡”成为一种日常，这些都是造成人们这么做的原因。

按照现在的价值观，“感染致死”应该是“要尽力避免的事”。然而，在现代科学和医学在多数老百姓的观念中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规范”普遍地扎根下来之前，是存在不同世界观的。我认为，抛开现代的成见，以历史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感染致死”意味着什么，这对历史学来说也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三位老师的报告，作为自由讨论者的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东亚地区的各个居留地之间，基于媒体的信息传达是通过怎么样一种方式运作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问，是因为另一位讨论者盐出浩之老师向我们揭示了，东亚不同国家的居留地（上海－横滨等）的媒体之间，有相互参照与讨论的交流网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在应对如 1886 年霍乱那种跨越国境不断蔓延的传染病时，来自大洋彼岸的其他居留地的信息是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我的问题，市川老师做了回答。他认为，居留地报纸上确有刊登其他国家的居留地中的疫情信息，但所载信息大多零零散散，倒不如说英国领事馆所建立的信息网在当时发挥着更大的功效。

总体而言，19 世纪应对传染病的历史让我深切感受到“即使不情愿，也必须要有超越国史的视野”。

大会结束后的线上联欢会，在没有同传的情况下被分为了“中文、韩语、日语”三个房间（break-out room）同时进行。中途我偷偷溜进了韩语的房间，用最近才开始自学的韩语进行了自我介绍，然后又表达了“很高兴能见到大家”的意思，之后由于韩语水平实在有限就没能继续说下去，壮烈牺牲了……（笑）最后还是劳烦同房间的一位精通日语的老师替我做了口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不需要口译的情况下同在场的诸位畅所欲言。我与各位老师约定了，等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再次聚首首尔与横滨（不是东京，而是拥有开港场历史的横滨！），我非常期待那天的到来。

앞으로 한국어를 더 열심히 공부합니다!（往后我还会加倍努力学习韩语！）

最后，我想向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优质的交流机会的主办方、事务局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尽心竭力使跨三国语言的交流成为可能的各位同声传译的翻译人员，致以由衷的感谢！

（转载自：国史邮件杂志“Kokushi Email Newsletter #30”）

作者简介

■ 朴汉珉 / PARK Hanmin

专业领域是韩国近代史和日韩关系史。2017年获高丽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曾在东国大学历史教科书研究所担任2年的专门研究员（博士后）。曾历任日本九州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外国人访问研究员与京都府立京都学·历彩馆京都学研究员，同时从事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现任高丽大学非常勤讲师，教授通识课程。以开港场为中心，就朝鲜和日本的条约运作、日本官员的朝鲜出访与侦探活动、近代知识的接受与流通、朝日两国人的交流与认识等主题发表多篇论文。

■ 市川智生 / ICHIKAWA Tomoo

1976年生人。横滨国立大学研究生院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科毕业（博士（学术））。曾供职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长崎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现任冲绳国际大学综合文化学院副教授。专业为日本近代史，医疗社会史。主要论文有：《近代日本开港场的传染病流行与外国人居留地问题：1879年“神奈川县地方卫生会”实施的霍乱对策》（《史学杂志》第117编第6号，2008年）、《明治初期的传染病流行与居留地行政问题：1870年和1871年横滨的天花对策》（《日本历史》第762号，2011年），合著有：永岛刚、市川智生、饭岛涉编《卫生与近代：从鼠疫流行看东亚的统治、医疗与社会》（法政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

■ 余新忠 / YU Xinzhong

浙江临安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副院长，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等著作，在《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东洋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9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进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多个国家级人才项目，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奖和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奖等多项奖励。

■ 金贤善 / KIM Hyunsun

韩国东国大学学术文化院HK研究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疾病史。2016年，于中国华中师范大学以论文《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与社会应对》获得博士学位。利用地理信息系统（ArcGIS）分析传染病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原因，试图将疾病史与地理学进行结合。对各历史时期的中国环境变化和传染病流行等主题颇感兴趣。

■ 盐出浩之 / SHIODE Hiroyuki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副教授。专业为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政治史。2004年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获博士（学术）学位。随后，供职于琉球大学法学院担任副教授，后升教授，现就职于京都大学。主要研究成果有《越境者的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

■ 秦方 / QIN Fang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2005-2011，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博士。2002-2005，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1998-200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学士。研究成果：《被记住的与被遗忘的：近代有关“七出”“三不去”的话语演变》，《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12月第6期。《制造吕碧城：晚清女性公共形象的生成与传播》，《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3月第2期。《从幽闭到出走——清末民初女性困顿-解放话语形成及实践》，《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7月第4期。Coauthored with Emily Bruce, “Our Girls Have Grown Up in the Family”: Educating German and Chinese Gir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 1, 2016; Later the revised version was collected in A History of the Girl: Formation, Education, and Identity, edited by Mary O’Dowd and June Purvis,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 103-122.《近代反缠足话语下的差异视角——以19世纪末天津天足会为中心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5月第3期。

第 5 届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 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参加者名单

	姓名 (罗马字)	姓名 (日语)	姓名 (韩语)	姓名 (中文)	所属单位 (日语)
论文报告人					
1	Park Hanmin	朴 漢珉	박 한민	朴 汉珉	東北亜歴史財団
2	Ichikawa Tomoo	市川智生	이치카와 토모오	市川智生	沖縄国際大学
3	Yu Xinzhong	余 新忠	위 신중	余 新忠	南開大学
指定点评人					
4	Kim Hyunsun	金 賢善	김 현선	金 贤善	明知大学
5	Shiode Hiroyuki	塩出浩之	시오에 히로유키	盐出浩之	京都大学
6	Qin Fang	秦 方	친 광	秦 方	首都師範大学
小组成员					
7	Aoyama Harutoshi	青山治世	아오야마 하루토시	青山治世	亜細亜大学
8	Akashi Yasushi	明石 康	아카시 야스시	明石 康	元国連事務次長
9	Biao Yang	楊 彪	양 바오	杨 彪	華東師範大学
10	Choi Joo-hee	崔 姪姬	최 주희	崔 姪姬	德成女子大学
11	Chong Soonil	鄭 淳一	정 순일	郑 淳一	高麗大学
12	Duan Ruicong	段 瑞聰	단루이충	段 瑞聰	慶應義塾大学
13	Han Seunghoon	韓 承勳	한 승훈	韩 承勳	韓國芸術綜合学校
14	Han Sungmin	韓 成敏	한 성민	韩 成敏	大田大学
15	Hirayama Noboru	平山 昇	히라야마 노보루	平山 升	神奈川大学
16	Huh Tae-koo	許 泰玖	허 태구	许 泰玖	カトリック大学校
17	Kim Bokwang	金 甫枕	김 보광	金甫枕	嘉泉大学
18	Lee Myungmi	李 命美	이 명미	李 命美	慶尚大学
19	Mukai Masaki	向 正樹	무카이 마사키	向 正树	同志社大学
20	Okawa Makoto	大川 真	오카와 마코토	大川 真	中央大学
21	Okubo Takeharu	大久保健晴	오쿠보 다케하루	大久保健晴	慶應義塾大学
22	Qi Meiqin	祁 美琴	치메이진	祁 美琴	人民大学
23	Sun Weiguo	孫 衛国	쑤 웨이궈	孙 卫国	南開大学
24	Wang Wenlung	王 文隆	왕 윈룽	王 文隆	南開大学
25	Yao Keisuke	八百啓介	야오 케이스케	八百启介	北九州市立大学
26	Yokkaichi Yasuhiro	四日市康博	오키카치 야스히로	四日市康博	昭和女子大学
27	Zheng Jiexi	鄭 潔西	정 제시	郑 洁西	寧波大学
组委会成员					
28	Cho Kwang	趙 珧	조 광	赵 珧	韓國国史編纂委員會
29	Kim Kyongtae	金キョンテ	김 경태	金 囙泰	全南大学
30	Li Enmin	李 恩民	리 언민	李 恩民	桜美林大学
31	Liu Jie	劉 傑	류 지에	刘 杰	早稲田大学
32	Mitani Hiroshi	三谷 博	미타니 히로시	三谷 博	跡見学園女子大学
33	Mura Kazuaki	村 和明	무라 카즈아키	村 和明	東京大学
34	Nam Kijeong	南 基正	남 기정	南 基正	ソウル大学
35	Peng Hao	彭 浩	펑 하오	彭 浩	大阪市立大学
36	Song Zhiyong	宋 志勇	송 즈용	宋 志勇	南開大学
同声传译					
37	Ding Li	丁 莉	정 리	丁 莉	北京大学
38	Song Gang	宋 剛	송 강	宋 剛	北京外國語大学
39	Lee Hyeri	李ヘリ	이 헤리	李 惠利	韓國外國語大学
40	Ahn Younghee	安ヨンヒ	안 영희	安 暎姬	韓國外國語大学
41	Jin Danshi	金 丹实	김 단실	金 丹实	通訳翻訳者
42	Piao Xian	朴 賢	박 현	朴 贤	京都大学
翻译					
43	Min Dong-yup	閔 東晔	민 동엽	闵 东晔	東京大学
44	Chen Lu	陳 璐	첸 루	陈 璐	東京外國語大学
45	Hong Yongil	洪 龍日	홍 용일	洪 龙日	東京大学
事務局					
46	Imanishi Junko	今西淳子	이마니시 준코	今西淳子	渥美財団
47	Tsunoda Eiichi	角田英一	쓰노다 에이이치	角田英一	渥美財団
48	Nagai Ayumi	長井亜弓	나가이 아유미	长井亚弓	渥美財団
49	Miyake Aya	三宅 綾	미야케 아야	三宅 綾	渥美財団

SGRA レポート バックナンバーのご案内

- SGRA レポート01 設立記念講演録 「21世紀の日本とアジア」 船橋洋一 2001.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2 CISV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への挑戦：多様性の中に調和を求めて」
今西淳子、高 偉俊、F. マキト、金 雄熙、李 來賛 2001. 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技術の創造」 畑村洋太郎 2001.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4 第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の皆さんへ」 関 啓子、L. ビッヒラー、高 熙卓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5 第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なかの新しい東アジア：経済協力をどう考えるべきか」
平川 均、F. マキト、李 鋼哲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6 投稿 「今日の留学」「はじめの一歩」 工藤正司 今西淳子 2001. 8.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7 第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共生時代のエネルギーを考える：ライフスタイルからの工夫」
木村建一、D. バート、高 偉俊 2001. 10.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8 第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 教育革命：ITは教育をどう変えるか」
臼井建彦、西野篤夫、V. コストブ、F. マキト、J. スリスマンティオ、蔣 恵玲、楊 接期、
李 來賛、斎藤信男 2002. 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09 第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と民族主義：対話と共生をキーワードに」
ペマ・ギャルポ、林 泉忠 2002. 2. 2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0 第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とイスラーム：文明間の対話のために」
S. ギュレチ、板垣雄三 2002. 6.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1 投稿 「中国はなぜWTOに加盟したのか」 金香海 2002. 7.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2 第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環境診断：地球の砂漠化を考える」
建石隆太郎、B. プレンサイン 2002. 10.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3 投稿 「経済特区：フィリピンの視点から」 F. マキト 2002. 12. 1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4 第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中の新しい東アジア」 + 宮澤喜一元総理大臣をお迎えして
フリーディスカッション
平川 均、李 鎮奎、ガト・アルヤ・ブートゥラ、孟 健軍、B. ヴィリエガス 日本語版2003. 1. 31 発行、
韓国語版2003. 3. 31 発行、中国語版2003. 5. 30 発行、英語版2003. 3. 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5 投稿 「中国における行政訴訟—請求と処理状況に対する考察—」 呉東鎬 2003. 1.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6 第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情報化と教育」 苑 復傑、遊間和子 2003.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7 第1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21世紀の世界安全保障と東アジア」
白石 隆、南 基正、李 恩民、村田晃嗣 日本語版2003. 3. 30発行、英語版2003. 6. 6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8 第1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研究：国境を越える取り組み」 高橋 甫、貫戸朋子 2003. 8.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19 投稿 「海軍の誕生と近代日本－幕末期海軍建設の再検討と『海軍革命』の仮説」 朴 栄濬
2003. 12. 4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0 第1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環境問題と国際協力：C O P 3の目標は実現可能か」
外岡豊、李海峰、鄭成春、高偉俊 2004. 3.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1 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 「アジア共同体構築に向けての日本及び韓国の役割について」2004. 6.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2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民族紛争－どうして起こるのか どう解決するか」 明石康 2004. 4.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3 第1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宮島喬、イコ・プラムティオノ 2004. 2. 2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4 投稿 「1945年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中国に対する援助：その評価の歴史」 フスレ 2004. 10. 25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5 第1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国境を越えるE-Learning」
斎藤信男、福田収一、渡辺吉鎔、F. マキト、金 雄熙 2005. 3. 31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6 第1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この夏、東京の電気は大丈夫？」 中上英俊、高 偉俊 2005. 1. 24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7 第1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過去・現在・未来」
竹田いさみ、R. エルドリッチ、朴 栄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 2005. 7.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8 第1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地球市民の義務教育-」
宮島 喬、ヤマグチ・アナ・エリーザ、朴 校熙、小林宏美 2005. 7. 3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29 第18回フォーラム・第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韓流・日流：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における
ソフトパワー」 李 鎮奎、林 夏生、金 智龍、道上尚史、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雄熙 2005. 5.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0 第1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文化再考－自由と市民社会をキーワードに－」
宮崎法子、東島 誠 2005. 12.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1 第2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雁はまだ飛んでいるか」
平川 均、渡辺利夫、トラン・ヴァン・トウ、範 建亭、白 寅秀、エンクバヤル・シヤグダル、F. マキト
2006. 2. 2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2 第2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留学生－」
横田雅弘、白石勝己、鄭仁豪、カンピラパーブ・スネート、王雪萍、黒田一雄、大塚晶、徐向東、
角田英一 2006. 4. 10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3 第2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戦後和解プロセスの研究」 小菅信子、李 恩民 2006. 7.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4 第2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と宗教：宗教って何なの？」
島蘭 進、ノルマン・ヘイヴンズ、ランジャナ・ムコパディヤヤー、ミラ・ゾンターク、
セリム・ユジェル・ギュレチ 2006.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5 第2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ごみ処理と国境を越える資源循環～私が分別したごみはどこへ行くの？～」
鈴木進一、間宮 尚、李 海峰、中西 徹、外岡 豊 2007. 3.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6 第2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は教育を強化できるか」
高橋富士信、藤谷哲、楊接期、江蘇蘇 2007.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7 第1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講演録 「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若者の未来と日本語』」
池崎美代子、武田春仁、張 潤北、徐 向東、孫 建軍、朴 貞姫 2007. 6.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8 第6回日韓フォーラム in 葉山講演録 「親日・反日・克日：多様化する韓国の対日観」
金 範洙、趙 寛子、玄 大松、小針 進、南 基正 2007. 8.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39 第2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私たちの出会いと将来～」
黒住 真、韓 東育、趙 寛子、林 少陽、孫 軍悦 2007.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0 第2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アジアにおける外来種問題～ひとの生活との関わりを考える～」
多紀保彦、加納光樹、プラチャー・ムシカシントーン、今西淳子 2008.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1 第2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いのちの尊厳と宗教の役割」
島蘭進、秋葉悦子、井上ウイマラ、大谷いづみ、ランジャナ・ムコパディヤヤー 2008.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2 第2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新疆講演録 「黄土高原緑化協力の15年—無理解と失敗から
相互理解と信頼へ—」 高見邦雄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8.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主義」 平川均 2008. 3.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4 第2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広告と社会の複雑な関係」 関沢 英彦、徐 向東、オリガ・ホメンコ
2008. 6.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5 第3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教育における『負け組』をどう考えるか～
日本、中国、シンガポール～」 佐藤香、山口真美、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2008. 9.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6 第3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水田から油田へ：日本のエネルギー供給、食糧安全と地域の活性化」
東城清秀、田村啓二、外岡 豊 2009.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7 第3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オリンピックと東アジアの平和繁栄」
清水 諭、池田慎太郎、朴 榮濬、劉傑、南 基正 2008. 8.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8 第3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延辺&北京講演録 「一燈やがて万燈となる如く—アジアの留学生と生活を共にした協会の50年」 工藤正司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 2009. 4.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49 第3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が格差を縮めるか」
東 茂樹、平川 均、ド・マン・ホーン、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09.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0 第8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韓の東アジア地域構想と中国観」
平川 均、孫 洌、川島 真、金 湘培、李 銅哲 日本語版、韓国語 Web 版 2009.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1 第3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テレビゲームが子どもの成長に与える影響を考える」
大多和直樹、佐々木 敏、渋谷明子、ユ・ティ・ルイン、江 蘇蘇 2009. 1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2 第3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市民社会と21世紀の課題」
宮島 喬、都築 勉、高 熙卓、中西 徹、林 泉忠、プ・ティ・ミン・チイ、
劉 傑、孫 軍悦 2010. 3.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3 第4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上海講演録 「世界的課題に向けていま若者ができること〜
TABLE FOR TWO〜」 近藤正晃ジェームス 2010. 4.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4 第3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エリート教育は国に『希望』をもたらすか：
東アジアのエリート高校教育の現状と課題」 玄田有史 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金 範洙 張 健 2010.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5 第3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都市・
建築のエネルギー事情とライフスタイル～」 木村建一、高 偉俊、
Mochamad Donny Koerniawan, Max Maquito, Pham Van Quan,
葉 文昌, Supreedee Rittironk、郭 榮珠、王 劍宏、福田展淳 2010. 12.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6 第5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 「中国の環境問題と日中民間協力」
第一部（北京）：「北京の水問題を中心に」 高見邦雄、汪 敏、張 昌玉
第二部（フフホト）：「地下資源開発を中心に」 高見邦雄、オンドロナ、ブレンサイン
201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7 第3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ポスト社会主義時代における宗教の復興」 井上まどか、
ティムール・ダダバエフ、ゾンターク・ミラ、エリック・シッケタンツ、島 蘭 進、陳 継東
2011. 12.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8 投稿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論への一試論」 平川 均 2011. 2.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59 第10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1300年前の東アジア地域交流」
朴 亨國、金 尚泰、胡 潔、李 成制、陸 載和、清水重敦、林 慶澤 2012.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0 第4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少子高齢化問題と福祉」
田多英範、李 蓮花、羅 仁淑、平川 均、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F・マキト 2011.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1 第41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共同体の現状と展望」恒川恵市、黒柳米司、朴 榮濬、劉 傑、林 泉忠、ブレンサイン、李 成日、南 基正、平川 均 2012.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2 第6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
「Sound Economy ～私がミナマタから学んだこと～」 柳田耕一
「内モンゴル草原の生態系：鉱山採掘がもたらしている生態系破壊と環境汚染問題」 郭 偉
2012. 6.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4 第43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蓼科 講演録「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課題と展望」
朴 榮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南 基正、林 泉忠、竹田いさみ 2012.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5 第44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蓼科 講演録「21世紀型学力を育むフューチャースクールの戦略と課題」
赤堀侃司、影戸誠、曹圭福、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石澤紀雄 2013. 2.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6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日英戦後和解（1994-1998年）」（日本語・英語・中国語）沼田貞昭
2013.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7 第12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太平洋時代における東アジア新秩序の模索」
平川 均、加茂具樹、金 雄熙、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敬黙 2014. 2.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8 第7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講演録「ボランテティア・志願者論」
（日本語・中国語・英語） 宮崎幸雄 2014. 5.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69 第45回 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紛争の海から平和の海へー東アジア海洋秩序の現状と展望ー」
村瀬信也、南 基正、李 成日、林 泉忠、福原裕二、朴 榮濬 2014.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0 第46回 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インクルーシブ教育：子どもの多様なニーズにどう応えるか」
荒川 智、上原芳枝、ヴィラーク ヴィクトル、中村ノーマン、崔 佳英 2015.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1 第47回 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科学技術とリスク社会ー福島第一原発事故から考える科学技術
と倫理ー」 崔 勝媛、島藺 進、平川秀幸 2015. 5.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2 第8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近代日本美術史と近代中国」
佐藤道信、木田拓也 2015. 10.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3 第1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第48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経済のダイナミズムー
物流を中心に」 李 鎮奎、金 雄熙、榎原英資、安 秉民、ドマン ホーン、李 鋼哲 2015.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4 第49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円卓会議「日本研究の新しいパラダイムを求めて」
劉 傑、平野健一郎、南 基正 他15名 2016. 6.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75 第50回SGRAフォーラム in 北九州講演録「青空、水、くらしー環境と女性と未来に向けて」
神崎智子、齊藤淳子、李 允淑、小林直子、田村慶子 2016. 6. 2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6 第9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フフホト&北京講演録「日中200年—文化史からの再検討」
劉建輝 2020.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7 第15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これからの日韓の国際開発協力—共進化アーキテクチャの模索」孫赫相、深川由紀子、平川均、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16.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8 第51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今、再び平和について—平和のための東アジア知識人連帯を考える—」南基正、木宮正史、朴榮濬、宋均營、林泉忠、都築勉 2017. 3. 2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79 第52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
劉傑、趙琰、葛兆光、三谷博、八百啓介、橋本雄、松田麻美子、徐静波、鄭淳一、金キョンテ
2017. 6. 9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0 第16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韓の国際開発協力—新たなアジア型モデルの模索—」
金雄熙、李恩民、孫赫相、李鋼哲 2017. 5. 1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1 第56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人を幸せにするロボット—人とロボットの共生社会をめざして第2回—」
稲葉雅幸、李周浩、文景楠、瀬戸文美 2017.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2 第57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2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蒙古襲来と13世紀モンゴル帝国のグローバル化」
葛兆光、四日市康博、チョグト、橋本雄、エルデニバートル、向正樹、孫衛国、金甫枕、李命美、ツェレンドルジ、趙阮、張佳 2018.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3 第58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アジアを結ぶ? 『一帯一路』の地政学」
朱建榮、李彦銘、朴榮濬、古賀慶、朴准儀 2018. 11. 1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4 第11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からみた中国美術史学」
塚本磨充、呉孟晋 2019. 5. 17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5 第17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北朝鮮開発協力：各アクターから現状と今後を聞く」
孫赫相、朱建榮、文昊鍊 2019. 11. 2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6 第59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3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17世紀東アジアの国際関係—戦乱から安定へ—」
三谷博、劉傑、趙琰、崔永昌、鄭潔西、荒木和憲、許泰玖、鈴木開、祁美琴、牧原成征、崔姪姪、趙軼峰 2019. 9.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7 第61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本の高等教育のグローバル化!？」
沈雨香、吉田文、シン・ジョンチョル、関沢和泉、ムラット・チャクル、金範洙 2019. 3. 2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8 第12回SGRA 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日中映画交流の可能性」
刈間文俊、王衆一 2020.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89 第62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が世界を変える時…? —不都合な真実を超えて」
ルウェリン・ヒューズ、ハンス＝ヨゼフ・フェル、朴准儀、高偉俊、葉文昌、佐藤健太、近藤恵
2019. 11.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0 第63回SGRAフォーラム講演録「第4回 日本・中国・韓国における国史たちの対話の可能性：『東アジア』の誕生—19世紀における国際秩序の転換—」三谷博、大久保健晴、韓承勳、孫青、大川真、南基玄、郭衛東、塩出浩之、韓成敏、秦方 2020.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1 第13回SGRA-Vカフェ講演録「ポスト・コロナ時代の東アジア」林 泉忠 2020. 1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2 第13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国際日本学としてのアニメ研究」大塚英志、秦 剛、古市雅子、陳 龔 2021. 6. 1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93 第14回SGRA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西思想の接触圏としての日本近代美術史再考」稲賀繁美、劉 曉峰、塚本磨充、王 中忱、林 少陽 2021. 6. 18 発行

■ 如想获取本刊，请联系SGRA事務局（TEL：03-3943-7612 Email：sgra@aisf.or.jp）

SGRA 报告 No. 0094 (中文版)

第65届 SGRA-V论坛

第五届 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编辑·发行 公益财团法人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 (SGRA)
邮编 112-0014 东京都文京区关口 3-5-8
电话: 03-3943-7612 传真: 03-3943-1512
SGRA网页: <http://www.aisf.or.jp/sgra/>
电子邮件: sgra@aisf.or.jp

发行日 2021年12月15日
发行人 今西淳子
中文版监修 于宁
印刷 (株)平河工业社

©关口全球研究会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关于本刊的文章内容, 如有疑问或欲引用请与我们联系。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opying is Prohibited. For inquiries or quotes, please contact us.

SGRA REPORT

SGRALポータル 中文版

NO. 94

第65届SGRA-V论坛

第五届

日本·中国·韩国

国史对话的可能性

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社会对策

